

# 仇庄项目

李牧日记

## 引子

- 1, A 图书馆
  - 2, 拐弯的梯子
  - 3, 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画
  - 4, 野餐派对
  - 5, 波普毛泽东和商店里的行为艺术
  - 6, HI HA HI HA……
  - 7, 55 个环形灯
  - 8, 萨莉和梦龙
  - 9, 离开村庄的一段时间
  - 10, 寒冷的冬天
  - 11, 25 块钢板
  - 12, 树枝圆圈
- 后续

## 引子

星期六，2013年1月12日 阴

过两天就要回老家做“仇庄项目”了，张芳在我的新笔记本第一页上写道：即将在你老家开始的项目，充满未知，请不要判断，就不会害怕，就能看清实相，尽心体验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Love you so much~

F 2013.1.12

## 1, A 图书馆

星期二，2013年1月15日 阴

从苏州坐两个半小时的高铁到徐州，再从徐州汽车站乘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到丰县，最后乘出租车到孙楼镇朱尧村仇庄，丰县城往南6公里，15分钟。一路上，都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只是到了仇庄村西头下路的时候，路面开始颠簸起来。冬天的村庄是灰色的。早上出发，傍晚到家。以往不是这样，回趟家要艰难得多。

现在，我坐在老家的被窝里，头和手露在外面，很冷。

明天去丰县城买东西——电动自行车、台灯和棉鞋。

我犹豫是否应该买一辆废弃的客车来做图书馆。一是成本高，二是不实用。可能还是租房做图书馆比较实用，也可以做我的工作室。

星期四，2013年1月17日 晴

雾霾散去，今天看到了太阳。

早上带着我的黄狗皮皮在大堤上行走，看到河边是大面积的平地，或许可以把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树枝圆圈”放置在那里。在村子里面，住宅地依然很紧张，没有大面积的公共空地。

图书馆就采用租赁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形式美感不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图书馆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助手钟鸣的住处也找好了，只是要考虑如何付钱给二叔。在农村里，大家会很客气的说不要钱，但不给钱是行不通的。

昨天去看望杨高举，我初中时候的画友。当年他没有考取美术学校，之后在丰县城里经营“三彩广告”字牌作坊，白天干活，晚上拉下卷帘门坚持画画。他自初中起就喜欢画毛泽东像，现在依然在画，同时画了很多民工题材的油画。他对我的创作表示好奇，我向他展示了我的网站。另有几个同学表示不理解我的作品，杨高举对大家说：“他是用思想进行创作，而我們是用颜料进行创作。”我觉得他或许能理解我的艺术。

我去商店看望王高启，他躺在商店里间的床上，他说他的腰不舒服。我和他说起我打算在村里做一个图书馆，他很果断地说：“这毫无意义，这里不需要图书馆。”

父亲一直说农民不会看书，我的工作徒劳的，终会被人看笑话。我说我不在乎，只是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强调说，在沙漠里长出的植物才是最珍贵的。

星期五，2013年1月18日 晴

一天的时间很短，做不了什么就过去了。

星期六，2013年1月19日 晴

上午，去县城看望我的初中美术老师魏懿善。几年前，他得了脑溢血，半身不遂。他不认得我了。他夫人说，他的大脑已经萎缩得和一岁的孩子一般，几乎没有了记忆。我想起前年来看他的时候，他还带着我看他的画，并约定下次见面一定带上我的画和他交流。他夫人说起当年他们结婚的苦日子，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在旁边听着，眼里浸满了泪。走的时候，我紧紧地拥抱了他。

星期天，2013年1月20日 雪

我租下了发小王前进儿子的房子作为图书馆，沿路，朝北，两层的楼，他们住楼上，我用楼下两间。

我找到我的小学老师魏永明，给他讲我做图书馆的意图并请他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和其他人一样他觉得我的想法不现实、赚不到钱也没有任何意义，我无奈地离开了。

半小时后，他找到我说：“我支持你，因为这是一项课题研究，既然是研究，那么无论成功和失败你都要接受。”

窗外正下着小雪，今年冬天特别冷，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懒惰。

星期二，2013年1月22日 阴

樊敬思大爷传话说让我出5000块钱房租给王前进的父亲王高礼，由他留多少是多少。这远远超出父亲的预期，他有些不高兴。最后谈下来的结果是3500元。

我的手开始生冻疮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一到冬天我的手和脚就开始生冻疮，红肿，溃烂，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愈合了。

星期五，2013年1月25日 晴

我请了二叔、樊敬思和王高礼制作图书馆里的家具，他们仨都是老木匠。仅用了两天的时间，书架和桌子都已完工，只剩下灯和椅子了。

上午去县城，和当年的画友们相聚，有些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都是中年人。当年的事情似乎还在眼前，时光就这么流走了。我们在一家看上去很脏的饭店“老灶台”吃了饭，附近临街的厕所也很脏，挖个坑就是大便的地方，放只桶就是小便的地方。就饭店和厕所来说，这里似乎一切都没有变，我记忆中的县城就是这个样子。

本来打算在图书馆门的上方做霓虹灯“A图书馆”，可是霓虹灯制作的工艺已经在这个县城消失了，没有人能做。无奈，只好让杨高举制作现在流行的发光字。这里就是这样，新的总是代替旧的，毫不留情。

星期天，2013年1月27日 阴

上午去县城，看到路边一家饭店开业，门口搭了台子，两个衣着暴露的女人伴着音乐在冷风和汽车的轰鸣声中又唱又扭。

星期三，2013年1月30日 雾

二姐在丰县做官的同学打来电话，说最好把图书馆项目和当地政府机构协商好，得到镇长的支持后再办，这样就不会有麻烦。不然，县里的文化部门会来找麻烦并且让图书馆难以办下去。

我找过几次我们村委书记，他知道我要做图书馆，就一直说忙，没有和我见面。我知道，他觉得图书馆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利益，因为他曾建议我直接把钱给他，由他来扶贫。我坚持说这个村子不缺钱，缺精神。我并不打算获得政府的支持，更不希望他们参与进来，所以我决定不要“打草惊蛇”。如果他们来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怕。

手上的冻疮很严重，我很多年没生过冻疮了。我的身体不适合在这儿。我从心里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必须做完这个项目后离开这儿。

星期二，2013年1月31日 雨

如果我的工作循规蹈矩或者按部就班的，将不会有多少意义。如果能挑战一些规则，模糊一些界限，打破一些惯性，尝试一种新的可能，就很有意义。

晚上，父亲说希望我买一些农业、养鸭、养兔等致富方面的书放在图书馆里，我果断地说：“不行。我觉得在村子里没有人看这样的书，我不想放这些书做样子给人看，买了也是浪费。”父亲咕哝着说：“你那些艺术书更没有人看。”

我小时候的玩伴洪伟坐下来，抽着烟，一口痰吐在我刚拖干净的地面上。我能禁止人们在这里吐痰吗？我能禁止人们在这里抽烟吗？不能。这种吐痰的习惯就像烟瘾一样，早就根深蒂固的生长在他们的身体内部了。

看着母亲善良的样子，我真高兴能和她相处在一起。吃完饭，父亲一抹嘴就出去了，她开始收拾饭桌并开始洗碗。我不好意思的说：“等我手上的冻疮好了，就帮你洗碗。”她笑着说：“男人要做大事情，哪能让你洗碗呢。”

星期天，2013年2月3日 雨

杨高举把图书馆门上的发光字安装好了，A 图书馆/A LIBRARY。他坚持不多收钱，1300元。

星期一，2013年2月4日 雨夹雪

上午给图书编号，安装无线网络。装网线的小伙子很好奇的翻看图书，看到艾伦·茨威格（Ellen Zweig）送给A图书馆的书，书上从头到尾都是女性生殖器的绘画，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口中说着：“我日，怎么是这玩意儿？”

在图书馆，总是有人来看个究竟，带着好奇，这样总是打断我的工作节奏。我把卷帘门下到齐膝的位置，就没有人来打扰了，我就可以安静地工作了。可是，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来这里是要用一道卷帘门把我和村庄隔离开吗？我必须把卷帘门打开，让人们知道、看到我在做什么。我不希望在我 and 村民之间有一道墙。

樊敬思、王高礼和二叔坚持不收制作图书馆家具的工钱（每人300元，包吃饭和吸烟），父亲用这些钱买了烟酒让我送给他们，他们收下了。

下午村支书王家运打来电话，说有时间和我会面。我和张芳去了他家，有些豪华的两层小楼。他很热情的向我介绍他收藏的绘画和书法，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块新疆的蓝田玉。说起图书馆，我说这是我的一个艺术项目。他说：“在邻村有个退休教师做了一个图书馆，县里拨了20万元给他，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傍晚去县城，接了那颖禹回家。我去年在纽约介绍仇庄项目时，来自北京的艺术家那颖禹也在纽约做驻留，他觉得我很难完成这个项目。于是，我们约定，我的项目开始的时候他就住进我的村子，他要见证我的失败。如今，他如约而至。

夜里，下雪了。

星期四，2013年2月7日 阴

书放在书架上很好看，却与这个村子格格不入。真的会像大家所说“根本没有人看书”吗？格格不入正是我工作的开始阶段，就像摆下一个棋局，接下来我会和村民一起对弈，谁输谁赢都不重要。

又下了一场雪，天更冷了。寒冷的气温，往往人会失去耐心，坐不住。



昨天去了县城文庙，以前是丰县博物馆，现在是给孔子烧香的地方。大殿西侧的院子里陈列着一些从村子里收集来的残旧石碑，一个被拦腰切成两半的石碑再度粘合起来，再看背后，居然是两个喂牲口的食槽。我觉得很有意思，文化往往被百姓们以这样的方式保留下来。

老那说要看《丰县志》，我问同学王明涛借了一本。这种书在市场上看不到了。看了一晚上书后，老那说这儿自从出了一个汉朝的刘邦皇帝和一帮将相后再没有出过人才，风水不好。宋代以前这里是沃土，种植水稻，因为连年黄水泛滥，后来成为沙土。我父亲说在我们村西头挖河时曾经挖出过一对水缸和建筑的地基，证明现在的黄沙土地曾经把以往的沃土和建筑覆盖。

星期二，2013年2月12日 晴

手上的冻疮很严重，所有人看到我的手都很惊奇，我说：“很多年没有冻过手了。”

除夕的晚上，我们放了两个很美的烟花，邻家的孩子们爬到房顶欢呼。第二天，邻家的小男孩跑过来，执拗的把烟花箱拆的支离破碎，他要看看个究竟。

磕头，是这里沿袭了多年的传统习俗，年初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到长辈家磕头，以示对长辈的尊重和新年问候。当然，我也默守着这个习俗。

图书馆在年初一的时候开放，我放了两盘炮响。孩子们和大人纷纷来看个新鲜，桌上有三篮不同的糖果，大家嘴里吃着，往口袋里塞着。很显然，孩子对书更有兴趣，他们很开心。大人们则带着一脸茫然，随手翻一下书，觉得看不懂就离开了。

年初二，二姐夫在酒桌上表达了他对我的图书馆的看法，他说我很“精”，我在用村民的愚昧和无知创作艺术。借助这个图书馆，我向世界展示这个村庄的愚昧和无知。对此，我并不多做解释，只是说：“你可以这么认为。”而我的外甥朝朝则认为我做图书馆是“脑子进水了”，因为这根本不能挣钱，他不断的和我商量是否能在图书馆里放置三台老虎机，以赚取孩子们的钱。

那颖禹酒喝多了，他说感觉到天旋地转，一直睡到晚上吃饭。

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华东平原上的小村庄，没有任何特点，可是，它几乎集合了中国乡村所有的问题。一切都很平淡，平淡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冲突和矛盾。

星期三，2013年2月13日 晴

上午，原丰县县长李玉领带着孙楼镇镇长和管文化的干部来图书馆，他是我岳父的老同学，张芳给他打了电话说我在做一个乡村图书馆。在图书馆，他问我表姐：“你不认识我吗？你应该认识我，因为十年前你天天在电视上看到我。”

他们问：“需要什么帮助和宣传吗？”我说：“谢谢，不需要。”

父亲心安了，前县长和镇长来过，就不会有人来惹麻烦了。

星期四，2013年2月14日 晴

荷兰领事馆说不能确定是否赞助我的项目，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个项目。我给查尔斯（Charles Esche）（荷兰 Van Abbe 美术馆馆长）写信说我需要资金和具体工作上的支持，他还没有回复。

星期五，2013年2月15日 阴

现在图书馆已经开放了，可是这些书和这里的人之间有一道鸿沟，人们对阅读没有任何兴趣。不管放置多少好书在图书馆里，他们都不会来阅读。

星期六，2013年2月16日 阴

今天下午，我到县城汽车站接来了钟鸣。他26岁，刚刚从大学毕业。我看他面目清秀，眼神清澈，少言寡语，就决定让他来做我的助手，尽管他从来没有碰过摄像机。

在图书馆，门外不时经过拖拉机和汽车，轰鸣声夹杂着尘土侵袭着图书馆空间，再加上不时来访的村民，我很难安心工作。

村民们觉得我做图书馆是赢利的，要么就是图名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回到村里来发展了。

老那回北京了，我不确定他是否回来，尽管他说他还会回来。

我有些孤独，想起张芳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话：你将在未经探索的大海上独自航行。

星期二，2013年2月19日 阴

我把图书馆的卷帘门拉下来，只留一道缝隙，一是挡风，二是告诉人们今天不开放。可是还是有人来看书，有孩子，有大人带着孩子。我不好拒绝，只好让他们进来。

孩子们拿起书，随便翻翻就换另一本。

我把一个孩子叫到我面前，问：“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他想了很久，说：“男人。”我说：“你再把那本书看十分钟，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十分钟后，他把书给我看，是关于一对女同性恋的摄影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男人。我问：“你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到她们在汽车里，在睡觉，在洗澡，在看地图……。”

我说：“你觉得她们俩是什么关系？”另外两个小孩抢着回答，一个说是姐妹，一个说是朋友。他不回答，只是摇头。我追问他：“既然不是姐妹和朋友，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关系。”顿了顿，他反问我：“她们是什么关系？”我说：“爱人。”三个孩子的神情有些腼腆，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跑开了。

星期三，2013年2月20日 晴

一大早，孙楼镇的文化站站长来看图书馆，听我简单介绍之后，就说要资助一些农业的书给图书馆。领导总是没有耐心听别人讲话，没商量地安排事情。

天气寒冷，钟鸣感冒了。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是凭着直觉决定让他来做这份工作。现在他很难和人沟通，没有应变能力。

我给了他一个工作：每天写日记。

我有些担心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要相信我的直觉，他的眼神清澈、单纯，我需要耐心等待他进入状态。

荷兰领事馆文化处来信，明确说不能赞助我的项目了，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事情已经开始了，我能半途而废吗？当然不能。

星期六，2013年2月23日 晴

昨天上午离开村子，傍晚的时候我就站在上海的街头了，似乎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上海。上海的水很难喝，一股漂白粉的味道。

在创作上，我有一点丢掉拐杖蹒跚行走的感觉。

星期二，2013年2月26日 阴

查尔斯来信表示他也没有能力找到更多的钱支持我的项目。乐大豆 (Davide Quadrio) (Art Hub Asia 总监) 想出一个办法：我画出仇庄项目的水彩方案手稿，之后以每幅 2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就能够得到一部分继续工作的资金。

星期三，2013年3月6日 晴

在上海歌德学院的讨论会上，我的朋友们讨论“仇庄项目”，他们提出很多质疑。

刘鼎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项目，我把当代艺术带到农民的生活空间里，将会对农民和村庄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对原有的生态平衡带来破坏。同时，农民被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利用。胡昀认为这是一次文化殖民，而我是一个文化殖民者。即便我不是有意为之，也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文化殖民的帮凶。

我很难在那样的场合做过多的解释和辩解，我不擅长这一点，只是听着。我感觉到一种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偏见。

我觉得是否解释都不重要，因为我对我的工作有信心，不必做过多的解释。我要把事情做下去，做完了，结果自然会出来。这样就不会把问题停留在语言上，而在具体的行动中。

星期天，2013年3月10日 晴

我一共画了 10 幅水彩画，现在已经卖掉了 5 幅，还有 5 幅等待买主。我的心定了许多，毕竟可以开始工作了。

当我在村子之外看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庞大的艺术项目；当我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项目是如此渺小，就像小石子扔进河里时泛起的涟漪。

下午刮起很大的风，整个村庄尘土飞扬。仅仅几分钟，图书馆里落满了一层灰尘，书被风从书架上拉扯下来。

柳树已经开始发芽，天气转暖，父亲的小鸟孵出来了。

## 2, 拐弯的梯子

星期一, 2013年3月11日 晴

我开始按计划复制 Van Abbe 美术馆的馆藏艺术作品了。

三年前, 我和查尔斯·艾申在上海《双倍无限》展览晚宴上聊天, 他问我: “李牧, 你怎么看我们的这次展览以及交流?” 我说: “上海和北京不缺少这样的展览和文化交流, 这样的交流是表面的?” 他反问我: “那什么样的交流才是深入的?” 我说: “为什么不把你们的艺术收藏带到我的村庄里展示呢? 那是一个偏僻、贫穷、没有当代艺术的地方。”他有些激动地说: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为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准备了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终于可以把想法变成现实了。

我请堂弟来源和他师傅孟现平制作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索尔·勒维特 (Sol LeWitt) 的作品“无题, 墙上结构/Untitled, Wall Structure”, 这个作品是用铝合金制作的一个梯状抽象结构。索尔·勒维特只是画出制作草图, 由助手或美术馆的工人完成。

没有和原作尺寸相同的铝合金方管, 孟现平联系了生产厂家, 厂家答应为我专门制作这个尺寸的方管。

我要复制的另一件作品是约翰·考美林 (John Kormeling) 的灯光装置“HI HA”。我请杨高举制作, 看过作品的照片后, 他束手无策, 他没有见过原作中使用的灯泡和材料。我想: 是不是应该变通一下, 更改材料和灯种来完成这个作品呢?

晚上看钟鸣拍摄的照片, 拍的很好, 我为之欣喜。对于表扬和鼓励, 我当然毫不吝啬。

星期二, 2013年3月12日 雨

今天早上开始打雷, 下雨。

中午接到孟现平的电话, 他说厂方不愿意专门为我生产我要求尺寸的铝合金方管, 我们只能选择接近的尺寸来替代它。

星期六，2013年3月16日 晴

10幅水彩画都已经有了买主。在我们以每幅20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6幅后，Van Abbe美术馆收藏了剩下来的4幅，每幅1500美元。

我对钟鸣的工作产生了信任，一旦信任建立起来，以后的工作就会顺利起来。

星期二，2013年3月19日 晴

可能感冒了，头昏昏沉沉的，我就早些坐在被窝里了。

我对钟鸣的工作不满意，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能和人沟通交流，似乎他已经习惯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要对他的工作提出要求：1，图书馆开放一个多月了，我们要拍摄村民对图书馆的态度。2，拍摄谈话时，要尽可能的离对象近，以防声音太小。3，采访时，注意风向。4，春天的风沙大，要爱惜摄像机，因为沙尘会毁了摄像机。

索尔·勒维特的“墙上结构”已经完成，来源、孟现平、孟现平的老婆和另一个徒弟刘棋做了4天，一共15件复制品。

材料费加上人工费一共是4800元，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200元。我打算把14个复制品免费送给14个家庭，另一个用于公共展示。

父亲很心疼我花那么多钱做这些东西，我说：“这个老板要的不多，人很老实。”他觉得我幼稚，他说：“这个人肯定赚了你好多钱。”我不做声，心里冒出一句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大姐和姐夫来帮我粉墙，因为我要在村里主干道边的两面墙上复制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画。姐夫是个老实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钟鸣说：“李牧是在修行。”姐夫很不高兴地说：“他自己修行，家人怎么办？难道他就不要家人了吗？”

我有些伤心，我觉得我最亲的人一点都不理解我。

大姐一直强调说大姐夫做一天活能挣三百块。等他们吃完晚饭离开的时候，我把装有1000元钱的信封塞到她手里，她推脱不要，我坚持给她，她收下了。

很多树已经发芽了，空气干燥起来。空气里充满尘土，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灰尘，我感觉到自己灰头土脸的。重型货车发出巨大的噪音并卷起漫天的黄土，充斥在道路的始终。

从心里来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儿。

星期三，2013年3月20日 晴

一大早，孟现平和来源来安装索尔·勒维特的“墙上结构”。我们将其中一个作品安装在图书馆隔壁樊备战房屋的后墙上。灰色的水泥墙，白色的作品。

没多久，樊备战的老婆气冲冲的找我，她说：“墙上已经写了‘禁止广告’，你怎么还是把这个架子给放上去了？”我说：“这不是广告，是一个美国艺术家的艺术。”她问：“艺术？你还在上面画花和鸟吗？”我说：“不画。”她满脸不高兴：“这让人看什么？难看死了！”我说：“我事先给备战哥打了招呼，如果你们不让放，我就取下来。”她没再说什么，走了。

很多人看到挂在墙上的作品，一格一格的，像梯子，却是乙字型的，不能当梯子使用。干脆我们称它为“拐弯的梯子”。

图书管理员魏永明老师领取了一个“梯子”，扛到自己家里，安装在客厅的门上面。他把茶叶盒、杯子、洗发水、花瓶之类的东西逐一摆在“梯子”的空格里。

二姐和二姐夫领取了一个“梯子”，二姐夫说这个设计不好，不能当梯子使用，并且外形像纳粹符号。最终，二姐坚持挂在客厅的墙上，不放任何东西在上面，只是当做艺术品欣赏。

一个远门婶子和我商量，能不能把她儿媳的十字绣挂在图书馆的墙上，图书馆空间大，来的人多，希望能卖掉它。我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下午，绣了一年多的十字绣《红楼群芳图》送来了，三米宽。我问她多少钱，她说她的心理价位是6万元。她说曾经有人绣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卖了10万元。

星期四，2013年3月21日 晴

我叔叔李太峰领取了一个“梯子”，挂在二儿子海涛的房间里，等海涛回来后往上面放东西，或者放置儿媳的化妆品。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过年的时候回家。

叔叔扛着“梯子”没有走多少路，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吃了一颗救心丸，坐了好大会儿才缓过来。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身体，是干活的好手，后来因为吃了很多治疗类风湿的药，类风湿治好了，心脏病就开始了。

樊敬思大爷领取了一个“梯子”。他家房子是老式的，空间小，放不进去。他把它挂在房屋走廊的檐下，然后把家里的工艺品摆在这个架子的空格里。他是丰县养路工区的退休工人，儿子住在县城，老伴给儿子看孩子，他一个人住在家里。院子里栽了樱桃树、柿子树、枣树、杏树和佛手瓜，杏树和樱桃树已经开花了。他说，希望以后能把“梯子”的空格用彩色的纸填满作为工艺品的背景，不同的工艺品就有不同颜色的背景，会更好看。



星期五，2013年3月22日 阴

我不信“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善恶，一出生就已注定。奶奶的邪恶遗传到父亲身上，这种邪恶根深蒂固地种在他的骨髓里面，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或许能对他有所制约，却不能改变他。

父亲心疼我把铝合金“梯子”免费送给别人，他想让我送给大姐一个，还想多要几个留家里。这时候，能看到他的狭隘和自私。

我想回家和父母多相处一些时间，现在看来，父亲根本不珍惜这份情感。

钟鸣喝了酒就把一盘拍好的录像素材给覆盖了，我们不得不找时间重新拍摄那些重要的镜头。

星期六，2013年3月23日 晴

今天去县城帮我的美术老师魏懿善整理他的画作。

阳台上的储物间里满是废品，挪开废品，一个破旧的橱子里面和顶上，塞满了他的油画。把那些画一张张拿出来，我有些感动，我看到一个污浊环境里的另一个世界。几十年，他从未辍笔，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画面的颜色都已经暗淡无光，外框廉价，满是尘土。他能在丰县坚持画画，没钱没名，简直是个奇迹。

那些画很朴素，没有多少绘画技巧。我不确定他的画到底有多少价值，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坚持画画的中学老师。我希望我能不带情感的看这些画，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他已经没有记忆和生活的能力，他想不起来我是谁，也不认识他的家人，他却始终不能忘记他的画。他总是一张又一张的把落满灰尘的画从阳台搬到卧室里，他守着那些画。晚上，家人把画搬回到阳台上去。第二天，他又把画搬回卧室里，就这样反复。

傍晚回来，送了一个“梯子”给李太金叔叔。太金叔叔很高兴，他很喜欢这个“梯子”。他以前是村子里的厨师，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去帮忙做菜。现在他在县城一家机关单位做厨师，有周末的休息，有养老保险。他一家人都信“主”，家里的客厅里贴着基督的肖像。

来源要了一个“梯子”，他把“梯子”安装在墙上，打算把他未来的婚纱照按格子尺寸冲印出来，卡在格子里。他正是说媳妇的年龄，还没有女朋友。

星期日，2013年3月24日 阴

今天继续整理魏老师的画。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意识到他的档案和文献的重要性。我不想把目光停留在那些画上，我想看到他和环境、时代的关系。我想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画。

星期二，2013年3月26日 雨转晴

父亲领取了他的“梯子”。他将“梯子”平着悬挂在过道天花板下面，用来悬挂鸟笼。今年家里会有一百多只金丝雀，很多鸟儿已经孵化出来了。去年，他养的鸟儿卖了八千多块钱，今年他信心百倍，扩大养鸟的规模。

星期五，2013年3月29日 阴

顺儿（李昌顺）领取了他的“梯子”，挂在客厅的侧墙上，说要给儿子放置照片。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儿子的婚纱照，因为女孩的作风不好，他们放弃了这门婚事。

栋栋是我四叔的儿子，他家的楼房已经盖好三年了，可是还没有找到对象。两层的小楼没有装修，空荡荡的。“梯子”挂在客厅的侧墙上，他说他会用镜子填满这些格子，然后再放置一些四大名著之类的书。

住在图书馆楼上的遥遥和楠楠快要有孩子了，他们领取了一个“梯子”，他们说等孩子出生后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梯子”的格子里，每年放一张，这样就可以放到孩子长大。

在洛杉矶留学的晓通来访，谈了很多他对于这个项目的看法。他说这种通过村民的手把他们最熟悉的材料转变为西方的当代艺术，是非常暴力的一个行为。我说文化的力量在世俗的利益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推动村庄变化的因素是利益，而非精神。

星期天，2013年4月7日 晴

李工作的老婆来要“梯子”，我说已经送完了，她有些失落的离开了。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将留给大姐的“梯子”送给她。李工作比我大一岁，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是镇上联防队员。小时候经常和他在一起玩，现在看他整天一幅当官的样子，我就主动和他保持距离了。

李工作的老婆如愿以偿的将“梯子”扛到家里，挂在客厅的墙上，摆上了他儿子的课本。

连营没有什么文化，却是村子里最富裕的人。他从村民手里收购铤好的木板，卖到南方的工厂里赚取利润，人们称他为“王百万”。当年，邻村袁楼的“万元户”吴猫要将自己智商不高的女儿英嫁给他，他因反对而遭到父亲的毒打。他被迫娶了英，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智商都不高。大家都说英虽然有些傻，却给他带来了财富。

英来取梯子，用三轮车运到他们在大马路边上的家里。他家有个很大的院子，用来盛放囤积的木板。她坚决不让我给她照相，她说她长得不好看。

连营的办公室很小，一张老板桌，一个热带鱼缸，一幅印着姚明的挂历。办公室放不下“梯子”，只好暂时放在厂房的角落里。

星期三，2013年4月10日 晴

树已经长出了叶子，一片绿色，多了一些生机和希望。路上很少能看到人，更看不到年轻人。人们都忙碌着赚钱去了，只有一些看孩子的老人留在家。

钟鸣把摄像机的录音设置改变了，导致我们拍摄的录像没有声音。

老那打来电话，说他过几天就来。

星期五，2013年4月12日 晴

钟鸣的工作还是存在很大问题，他做不了采访和谈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和懒惰的一面，我们该如何对待它们？任由其生长还是克服它们？

燕柳婶子来找我谈心，她说她的家庭和商店一团糟。她丈夫王高启因为没有男孩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有两个女儿），整天卧床不起。在农村里依然重男轻女，没有男孩的家庭很少。商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不好。我多次看到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团糟，我说：“如果你处理不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何传福音给别人呢？”

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作品里的环形荧光灯依然买不到，我在网上查到在南美有售，我不太可能从那里购买。我查到这批货的产地在中国广东的佛山，就联系到佛山的制造商。厂家说目前没有生产该种产品。我该怎么办呢？

王学义领取了“梯子”，挂在他女儿的房间里。女儿读高二，每周末回家一次。他和我从小就是邻居，目前靠养猪和给木板加工厂剌木头来谋生，就是把树干上多余的部分锯掉以适合铉木机器的规格。

星期六，2013年4月13日 晴

李昌标领走了最后一个“梯子”，他是货车司机，总是出车，就抽不出时间来搬“梯子”。他把它放在厢房的客厅里，他也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只是想要拥有。

到了夜里，我的心才安静下来。

### 3, 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画

星期日, 2013年4月14日 晴

我计划在每个周末给孩子们播放两部电影, 我们称之为“周末电影院”。

今天播放了两部电影, 《一年级生》和《无敌掌门狗-发明的世界》。

孩子们对电影的兴趣不大, 半个多小时后就坐不住了, 陆续离开。现在的孩子们不比我那一代人, 那时候只要看到能动的影像就会有兴趣。或许, 孩子们见的世面多了, 对什么都不足为奇。

拓宽道路的拆迁已成定局, 沿着原来道路的中点, 向南北分别拓展20米。图书馆在拆迁的范围内, 我家的主房也在拆迁的范围内。

这两天, 村里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件事。父亲和母亲寝食难安, 盘算着房子拆掉后该往哪里去。王高启的商店也将要拆除, 他很忧愁, 修路毁了他谋生的场所。狗蛋刚盖好的两层小楼, 计划给两个儿子结婚用的, 还没住就要拆除。

我叔叔在院子里搭上临时铁皮瓦棚, 说是能得到多一点赔偿。

大路两边的人家都在大兴土木, 装修房屋, 搭建临时建筑。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甚至鄙视这种做法。可这就是现实, 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担心拆迁会使我的艺术项目中途夭折, 可是我抵抗不了这种强大的现实力量, 只能顺其自然。

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牵着狗到河堤上坐了一会儿。事情很不如意, 我对钟鸣的工作能力不满意, 对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不满意, 对这个项目的进程不满意。

我对图书馆越来越没有信心, 大人们不看书, 孩子们对图书也没有多少兴趣。我曾经说图书馆是一扇打开的窗户, 现在窗户在这儿了, 却没有人往外看。

星期一, 2013年4月15日 晴

今天的心态好了许多。

面对新的情况, 我有些急躁, 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接纳新情况, 做出相应的工作调整。

星期三，2014年3月17日 晴

人们开始在院子里、屋前屋后搭建临时建筑，重新装修房间——吊顶、贴复合地板和墙纸。这看起来有些荒唐，建设是为了拆除，为了获得多一点赔偿。

本来父亲是不赞成这么做的，当大家都在忙碌着搭建的时候，他就坐不住了，开始和我商量在家里搭建临时顶棚。我不同意他的做法，我说：这么做没有出息。

本来和洪伟的妈妈说好在她家空地上做理查德·朗的“树枝圆圈”装置的，可是今天早上洪伟的哥哥请了工人在地上立柱子搭棚。洪伟的妈妈看到我很难为情地说：“他要搭棚，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大家都处在急躁和忙乱中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要被这种情绪扰乱，我需要一个安静和平的心。我的艺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已，在利益面前没有任何抵抗力。

我去卢道德家里拜访他，他正在画神像。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民，和农民不同的是他会画画。农村里信神信鬼的人很多，他就接了很多画神像的订单。订单的价格很低，一米见方的画上通常有四五个人物，收费在两百块钱左右。他早年学习工笔花鸟，因为文革，他的艺术不能为政治服务被划为“封资修”批判，转而回家务农。他做过木匠，当过教师，为古建筑画过装饰图案。

我向他展示了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上绘画（Wall Painting, No.480 和 No.256），并邀请他和我一起到村子里复制这两幅画。他非常肯定地拒绝了我，三个理由：一是他非常排斥西方的艺术，他无法在这样的艺术里看到任何意义；二是他接了很多神像订单，没有时间；三是他年龄大了，他恐高，完成不了这样大幅的作业。

我说：“这个工作有报酬，Van Abbe 美术馆会给我们制作经费。另外，高处的我来画，你只要负责低处的工作就可以了。”

他开始和我讨论制作画面的流程和方法，说这样的工作对他过于简单了。我向他确认他愿意制作这两幅画，他说：“没有问题。”

星期六，2013年4月20日 阴转雨

我和卢道德合作完成了索尔·勒维特的第一幅墙画“无题，墙画 256 号”。

这幅墙画绘制在我家邻居二攀的后墙上，墙边有两棵光秃秃的柿子树，一簇迎春花已经开出了黄色的花朵。

卢道德出主意说用喷枪来完成整个画作，我坚持说原作是用刷子画出来的，用刷子画出来更有绘画感。我们用油漆绘制墙画，颜色按照索尔·勒维特的指示草图完成，没有太费劲。卢道德画得很卖力，午饭时喝了一杯酒，饭后不休息，继续干活。

傍晚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们坚持把画画完后，雨才大了起来。我在画的右下角签上了卢道德和我的名字。

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看，大多数人会说很漂亮，同时还会表示看不懂。他们问我在画什么，我说是一幅抽象画，我向他们解释什么是抽象画。他们依然不能理解，我干脆说：“你觉得像什么就是什么吧。”一个叔叔说：“这像两颗彩色的钻石。”

卢道德很开心，晚饭时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看来，他很享受画画的过程，很享受我们俩的合作。

星期一，2013年4月22日 阴转晴

我和卢道德合作完成了索尔·勒维特的第二幅墙画“无题，墙画480号”。

这幅墙画画在图书馆往西第三个房子的后墙上，两侧都是两层的小楼，前面是一根电线杆，顶上是两个大喇叭。

在索尔·勒维特的指示图上说在黑色底的墙上找到4个角和4个中点，分别用白色粉笔画出10根线条，线条的角度和长短由工人决定。因为这个作品在室外，粉笔画经受不了风雨。所以我们在墙上先涂了两遍白色涂料，然后用美纹纸（胶带）在墙上从4个角和4个中点分别拉出10根长短不一的线条。我说线条的长度是随意的，卢道德坚持遵循原作中的线条长短和角度。这导致我们的工作进度很慢。接下来用黑色的墙漆把整面墙涂了一遍，最后再把美纹纸（胶带）撕掉，长短不一的白线条露出来，这幅画就完成了。

很多人过来看我们的墙画，都说看不懂，也不觉得好看。钢弹叔看了很久，在我告知他这是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后，他说看懂了：“这些发射的线条是导弹的方向。美国是世界警察，要用导弹侵略别的国家，艺术家把这种现象表达出来了。”他问我：“我的理解正确吗？”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方式，你说的很有道理。”

卢道德很享受工作过程，很投入和卖力。似乎，他也很喜欢我们的墙画，我能感受到他的愉快。在村里，他的口碑不好，没有人因为他会画画而尊重他。显然，他也是瞧不上周围的农民，他有些高傲，总是仰着头。

星期六，2013年4月27日 晴

天气升温，似乎到了夏天。我把深蓝色的外套脱下来，换成白色的衬衫，这样可以的心情像天气一样好起来。

大雨过后的积水很快就被干涸的大地吸干了，或者是被灼热的阳光蒸发了。地上、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黄土。

槐花开了，餐桌上多了一道槐花菜。

要拆迁的房屋被丈量和登记过了，村子里又恢复了以往的秩序。

商店老板王高启又躺在床上睡了一个星期了。他老婆说他不能面对修路和拆迁，因为他们的商店和家就要没有了，他们又没有钱盖新的房子。他先是哭了两天，然后就卧床不起。他总是这样，遇到事情就睡觉，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早上去看他，我对他无能为力。

老那说他开始觉得这个项目有些无聊，没有开始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也没有冲突和矛盾发生。

我觉得如果这个项目有很多冲突和矛盾，就可以做出一个故事性很强的纪录片，但故事会取代艺术本身。

这些作品和我一样，不能改变村子里的任何东西，不过是这个环境里的一个装饰和点缀，也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会适应这些东西的存在，并且会逐渐忽略这些东西的存在。

日日是好日！不管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都是美好的一天。

星期日，2013年4月28日 晴

下午采访卢道德，谈话围绕着他喜欢画画展开。似乎，只要命运给他安排一次机会，他的绘画生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一直争取画画机会，但是他的才华还是被这个环境给压制了。现在老了，就没有野心了。他没有留下一幅作品，这倒也彻底、干净。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留下多少作品，而是否悠然自得才是最重要的。有成绩和没有成绩，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快乐，也不影响一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他觉得和我的合作意犹未尽，太短暂了。



#### 4, 野餐派对

星期二, 2013年5月1日 晴

时间过的很快, 转眼间已经进入五月份。这几天, 村子里飘舞着杨絮, 像下雪一般。大卡车卷起阵阵尘土, 天气干旱, 很久没有下雨了。

在“周末电影院”中, 动画片能吸引住孩子们的注意力, 他们能坚持看完一部动画片。

星期一, 2013年5月6日 阴

或许是摄像机在场的缘故, 或许是我喝了一瓶啤酒的缘故, 晚饭后我质问父亲是否为他当年极力反对我考大学以及缴不上我的学费而自责。他很生气, 很伤心。我一直不能为这些事情释怀, 我和父亲之间有很深的隔阂。

看到他伤心的样子, 我就责备自己, 我应该理解他当年的难处, 不应该揭他的伤疤。如果这些言语让我释怀而令他伤心的话, 那我就是很自私的人。

早上, 我向他道了歉。他哭了, 哽咽着说: “我一直以为你瞧不起我这个没有本事的父亲。”

回到这个村庄, 我意识到我所有的劣根性都是来自这儿, 我能看得清楚这满身的污垢。我不再掩饰它们, 我想抛弃它们。很多年, 我都在极力维护我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就是这自尊, 让我离我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意识到这一点, 我才开始学着慢慢放下。

我以为我很完美和强大。回到村庄里, 回到家里, 我才意识到我身上存在太多的问题。我不会处理事情, 我不会和人相处。我身上有太多的狭隘和自私。我希望我是豁达和通透的, 可是我却做不到。

想起老那的话: 艺术是一张破网, 到处是洞。生活不就是一张破网吗? 哪儿破了就去补哪儿, 一刻也停不下来。

星期三，2013年5月8日 晴

正杰 (Jay Brown) ，美国人，第一个来到仇庄的外国人。人们看到外国人，看到正杰满头的卷发，蓝色的眼睛，就像看到大猩猩一样好奇。

正杰在中国的云南丽江做“丽江工作室”，他在一个村庄租下一个院子，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做驻留创作。十几年下来，他们做了很多有趣的艺术项目。

去年我在纽约正杰的家里和他说起我的仇庄项目，他怀疑我是为美术馆做这个项目，并不是真的如我说的那样：为我自己和这个村庄而做。所以，当他接到我的邀请的时候，欣然而至。

星期五，2013年5月10日 晴

我叔叔前些天打算在他的门口的空地上搭棚子，我母亲看到了，说：“不管你怎么搭棚子，这块地都要算我家的。”叔叔很不开心，他希望我父亲能在正式测量宅基地的时候把他门口原本属于我家的那片地让给他。

叔叔说他就是拼了命也要把那块地从父亲手里争过来。

我找魏老师来协调，希望我父亲能够把那一小片空地让给叔叔，可是父亲坚持寸土不让。叔叔坚持说父亲的院子曾多占了祖上的地，他也应该有份。双方都不让步，两个人都有心脏病，我担心事情闹大，最终会两败俱伤。

测量宅基地的头一天晚上，我找叔叔商量：“能否看在我的份上，不要和父亲争那片地。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住在家里，还有外国人，如果发生家庭矛盾，会对我的事业不利。如果叔叔能放弃吵架，就是对我的支持。”

终于，叔叔同意了，他答应我不再和父亲争地，不再闹乱子。

第二天的测量很顺利，没有矛盾发生。

往往，我们会站在“正义”的一方，可是这样会激发更多的邪恶。我们习惯用正义和非正义来区分事物，可是我们很少考虑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正义者也具有邪恶的一面，非正义者也具有善良的一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暖的一个角落，哪怕他“十恶不赦”。

星期六，2013年5月11日 晴

老那、正杰、钟鸣和我做了一天的徒步，目的地是宋楼。天气酷热、阳光当头，我们先是沿着复新河行走，中午时到了王岗集闸。在一个农家乐饭馆吃了驴肉，喝了啤酒，然后在河边的树林里休息了两小时，继续行走。没有路了，转到省道丰黄路继续行走，傍晚时到达宋楼

镇。逛街，吃冰激凌，喝水，乘坐小面包车返回仇庄，精疲力尽。当人们知道我们徒步到宋楼的时候，都说我们是“傻子”。

星期二，2013年5月14日 晴

艾伦·茨威格 (Ellen Zweig) 这个周末到仇庄来，我打算让她和孩子们做一次野餐派对，分享一个下午的时间。艾伦是纽约的录像艺术家、诗人，我不打算介绍她的艺术给孩子们，只是希望她能和孩子有一次接触和交流。我做了海报张贴在村子里，很快，孩子们陆续来图书馆报名，已经26个孩子了，我马上在海报上写上：报名已满。

星期三，2013年5月15日 晴

钟鸣最近很少说话，似乎关闭了和人交流的门。遇到问题不是想着如何解决，而是不断得拖延，直到我有些着急了，找他交流。我不能确定找他做助手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不能表达、不和人交流是他的性格，要改变这一点很难。大多数事情他是不能独立完成的，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被照顾的位置，而不能主动地照顾别人和把握事情。

我从广州中山购买的环形灯通过德邦物流运到丰县了，我们把它取回来，打开箱子，却发现很多灯碎掉了。厂家没有在包装上采取保护措施，损坏是必然的。我打电话给厂家，把损坏的灯的照片发给他们，写了信，可是依然没有等到回复。我痛恨中国企业这种不负责任的做事方式，可是我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二姐夫在晚饭期间对正杰发起一连串的提问，问题集中在美国为什么老是侵略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当世界警察，为什么要行霸权主义，为什么要帮助日本和韩国来遏制中国等等。正杰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样来和他对话，他怯生生的问：“你当过兵吗？”因为他感觉到二姐夫对美国的仇恨，仇恨让彼此无法沟通。

我把话题转移开，谈话开始围绕着美国的农民生活、美国是否有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讨论。正杰很有耐心给大家讲述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对文化、艺术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喝了很多白酒，正杰喝醉了。

星期五，2013年5月17日，小雨

昨天下午迎来了艾伦和她的助手杭亚。

父亲很开心，他对艾伦说他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自豪。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说，我总觉得他看不上我，因为他从来都不肯定和表扬我。

我带着艾伦参观了复新河、医院、小学（现在是个收集瓶盖的工厂）。

在商店边，艾伦坐在村民中，大家都有些拘谨，不知道要说什么。艾伦也同样拘谨和害羞，有点不知所措。她一点都不油滑，这一点很令人喜欢。

明天的安排是“和艾伦-茨威格一起野餐”，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有一天的细雨。如果一直下雨，我们将会把野餐放在图书馆里举行。

星期六，2013年5月18日 阴

野餐在村北杨树林进行。

艾伦制作了三明治、土豆莴笋和水果沙拉。我们还准备了可乐和橙汁，还有啤酒。

报名表上是28个孩子，可是现场却来了41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跟着。随着野餐的进行，陆续有新的孩子加入进来，也有大人加入进来。显然，人数是控制不住的，幸亏我们准备的食物很多，多到孩子们都吃不下了，大人们也人人有份。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孩子们开始背唐诗、唱歌给艾伦。艾伦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说要做医生，有的说要做教师，有的说要做飞行员。艾伦说：“怎么就没有人想做艺术家？”一个孩子说他要改做艺术家。艾伦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做艺术家可以出国。”

孩子们有些腼腆，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等着派发食物。他们不喜欢提问，喜欢被安排的节目，喜欢集体背诵诗歌。当被提问时，他们用最简短的句子和词来回答问题。

这是我们村孩子们的第一次野餐，他们很新奇和高兴。第二天，依然有一个女孩（四叔家的李娟）穿上漂亮的裙子，闹着还要参加野餐派对。直到我们告诉她活动只有一天的时候，她才失望的回家了。

感谢艾伦给孩子们带来美好的时光，感谢我们的工作团队：魏永明老师、张杭亚、二姐、四妮婶子、钟鸣和那颖禹。

## 5, 波普毛泽东和商店里的行为艺术

星期天, 2013年5月19日 晴

我联系了一家印刷厂来印刷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创作于1972年的毛泽东像。这家工厂在县城西关, 接待我的人叫蒋波, 他看上去并不热情, 却显得很守信用、很干练。看了我做好的稿件, 他要求不要在画的下方放印刷厂的名字, 他说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 我们就把“润色印刷厂”改为“润彩印刷厂”, 他说这个名字很好听。我没有和他砍价格, 因为他有一张让人信任的面孔。我要求在印刷前通知我们, 以便我们拍摄印刷过程。

星期一, 2013年5月20日 晴

我从 Van Abbe 美术馆选择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6部行为录像在王高启的商店里展示, 分别是《无量之物》、《啊啊啊-啊啊啊》、《白天与黑夜》、《静止的能量》、《情人·长城 1》和《情人·长城 2》。

我把我家里的电视机和DVD播放机搬到商店里, 放在柜台边的冰箱上, 面对着顾客。考虑持续的播放会用一些电, 以及需要王高启每日播放录像, 我给了他500元钱的报酬。我说: “你每天上午营业的时候开始播放, 晚上8点没有顾客的时候关闭。不管有没有观众, 要保证录像是一直播放着的。”

像以往大家对作品的反应一样, 很多人都说看不懂。大家习惯了看故事, 不习惯看没有故事情节的表演。但是, 这些表演能激起他们的思考和讨论, 尽管他们一直强调看不懂。王高启说他最喜欢行走长城的录像《情人·长城》, 他一直在琢磨该怎么给人解释这个录像。这些录像将在小卖部展示三个月, 人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和消化他们。我本来担心有裸体的表演录像《无量之物》会令村民难以接受, 现在的问题只是他们不理解这个行为, 并不觉得展示裸体有什么不妥。

星期三，2013年5月22日 晴

在商店里，有一个嫂子觉得《无量之物》里的裸体表演是下流的，她捂着眼睛跑开了。王高启似乎也有所顾忌，看到妇女来的时候，如果正在播放《无量之物》，他就关掉电视机，等妇女买好东西走了，他再打开。也许是因为他拿了我的报酬，当我问及他是否顾忌录像里的裸体时，他说这没有问题，他能理解和接受。

我们开始在村子里张贴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行为表演录像的宣传海报。我们把海报设计成和村子里的商品海报一样的风格，这样就不会显得和村庄格格不入。今天上午，张世杰跑过来说我们的海报上出现了错误，我们把“乌雷从嘉峪关长城向东行走”误写成“乌雷从山海关的长城向东行走”。于是，我们用钢笔逐张把“山海关”改成“嘉峪关”。

星期四，2013年5月23日 晴

印刷厂没有通知我印刷的时间，就连夜把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印出来了。蒋波强调说他的老板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中国政府不支持当代艺术，他担心这会给他带来麻烦。海报的纸张比他给我看的样纸薄了许多，不过颜色还不错。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因为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让你防不胜防。我也理解了为什么父母总是教导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因为他们都吃过很多亏。

一个朋友看到这三幅毛泽东肖像，他说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毛泽东的三个时期：红色代表他的革命时期，那时候他充满激情和活力，发动革命，赶走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黄色指的是建国以后，他开始昏庸，迫害右派分子；蓝色指他晚年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他是黑暗的，把中国推向深渊。

星期一，2013年5月27日 阴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一刻都没停下来。路上积满了水，再一次变成河流。河沟里也积了很多水，垃圾漂浮在水面上。

有两件意料之外的事情：1，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樊梦在装修自己的楼房，他模仿索尔·勒维特的“无题，墙上结构”制作了一个木质相同的结构，作为储物架安装在墙壁上。2，李太金叔叔来邀请我在他的新房子里再做一幅索尔·勒维特的“无题，墙画480号”，并且由他自己来决定底色。同时，我也和他商量把卡尔·安德鲁（Carl Andre）的25块钢板安置在他新房子的地面上。

星期五，2013年6月7日 阴

表姐家的儿子替替在广州失踪，后来他的尸体浮上水面被打捞上来。据说是失足落水而溺亡。今天，他的骨灰运到家里下葬。表姐哭啊，哭啊，哭的人都虚脱了。

钟鸣的工作效率很低，工作能力也很差。我再一次怀疑我的选择，他根本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我必须明确地安排他具体的工作，并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今天下午把三幅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挂在了李昌标家的后墙上，每幅两米的高度，杨高举制作了它们。

杨高举曾经画了很多毛主席像，他对毛泽东极度热爱，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还是书法家、诗人。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米大的肖像喷绘的精度不高，特别是那幅蓝色的肖像，我有点不满意。可这就是现实，在县城的喷绘就是这种水平，我不得不接受。

三幅肖像固定在李昌标家的房子后墙上，似乎就应该属于这里，因为陈旧的砖墙上还残留着看不清楚的标语痕迹。

三幅毛泽东像面对着李昌顺的家和板子作坊，以及那只不停吼叫着的黑色藏獒狗。李昌顺很开心，他觉得这三幅毛泽东可以给他的工厂和家庭带来平安和吉利。

很多人来围观，他们都一致的不能接受蓝色的那幅，他们觉得不好看，是对毛主席的不敬。路过的人纷纷回头，有的停下来用手机拍照。

晚上，杨高举把我的项目写在他的博客上。显然，他开始喜欢这个项目。

我父亲一直不赞成我做这三幅《毛泽东》，他看拦不住我，就在旁边看我们安装，一根烟一根烟的抽着。

星期天，2013年6月9号 晴

派送毛主席像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大多数家庭在我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人的，我们只好选择傍晚去送，工作到天黑，也送不了几户人家。很多信基督教的人是不愿意张贴的，也有很少人不介意。一些人觉得贴毛主席像吉利，因为毛主席可以趋吉避凶。一些人觉得以后这几张肖像可以升值，就想拥有。当然，也有人出于对我的工作的支持而接受。

人们总是问我们这三种颜色是什么意思，老那说：红色的毛主席可以保佑你们身体健康；黄色可以保佑你们财源滚滚；蓝色的那幅则可以辟邪，把妖魔鬼怪都吓跑。这样，人们就能理解并接受它们了。

星期一，2013年6月17日 晴

最近写日记少了，和自己的懒惰有关。

天气极度炎热，就像天气极度寒冷一样，只想呆着，什么都不想做。老那走了，我必须要重新对工作充满热情，不然工作就会像一潭死水，了无生趣。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穿着旧军装、军帽上佩戴毛泽东像章的人，我就上前和他搭话。原来他叫孙光法，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他说他收藏了很多毛主席像章和招贴画，我提议送他两套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像，他很开心。

他文革的时候是红卫兵、造反派。他从那时候就穿军装，佩戴毛主席像章，一直到现在。他狂热的崇拜毛泽东，他说是毛泽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甚至他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壮举，毛泽东是世界级的伟人。

他的谈话有些激昂，谈论毛泽东的时候表露出对现世领导人的不满。我很平静地和他谈话，听他诉说，尽管我不完全认同他对毛的态度和观点。

今天，公路上发生了两起车祸，分别轧死了一个老人和两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周末电影院”，我们播放了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之旅》和宫崎骏的《萤火挽歌》。电影散场后，没有讨论，收拾椅子，离开。

我的小学同学张世国带着女儿张茜茜来跟我学画，我看她沉默、倔强，画出的线条沉稳，觉得她是一块画画的好料。就这样，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图书馆画画。

星期四，2013年6月20日 晴

天气极度闷热，昨天去几个工厂送毛主席像，出了很多汗，衣服都湿透了。

我中暑了，身体不舒服。傍晚去河堤遛狗，跑了一会儿步，顺便采了一束野花，插在可乐瓶里，放在图书馆的桌子上。

身体不适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身体和精神的关系。我总是强调精神的富足并享受精神生命，可是我却忽略和怠慢了我的另一个生命——身体。我贪婪地吃肉、饮酒、喝垃圾饮料，超负



荷地工作，把身体弄得很糟。这样，我就不能享受健康的身体带给我的愉悦和舒适。精神和身体是一体的，平等的，不能有区别地对待它们。我决定，我要用最简单的食物来款待我的身体，坚持锻炼身体，享受我的身体。

钟鸣问我对他最近的工作是否满意，我说我越来越信任他的工作了。

我计划在图书馆门口种上一片玉米，围栏用丹尼尔·布伦 (Daniel Buren) 的条纹画来装饰。本来计划把这些条纹画画在王合东的楼上的，可是因为他的楼房面临拆迁，他不居住在这栋房子里。我担心这些画展示在墙上，只是起到装饰效果，并不能和他的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这样，这个作品就很飘，没有份量。

父亲听说我要花钱找铝合金工人来制作围栏，他就开始阻拦我，他觉得我在乱花钱，起不到作用。

樊静思和王高礼大爷开始制作丹·弗莱文 (Dan Flavin) 的 55 个环形灯装置，他们担心装置放在户外遭到破坏，就打算将这个装置做成活动的，白天挂在户外，晚上收回家里去。也许这是个好主意，只是收来收去有些麻烦，不过却解决了雨淋的问题。

杨高举开始制作约翰·考美林的“HI HA”灯光装置。我们重新选择了材料，用铁皮字和 LED 灯代替来制作这个装置。

我开始准备 6 月 25 号在澳门的讲演，我将在圆桌会议上介绍仇庄项目。

星期二，2013 年 6 月 25 日 晴

这一次到澳门行色匆匆，甚至都没有时间会一下朋友。圆桌会议在威尼斯人酒店举行，整个会议是英文的，我用英文讲，用英文听。很吃力！我的英文发音实在是太差了！自己觉得很难听。会议间歇，很多人表示很喜欢“仇庄项目”。

带了照相机，走在富丽堂皇的威尼斯人酒店，没有拍一张照片。

星期三，2013 年 6 月 26 日 晴

早上乘大巴从珠海到了广州，住在博尔赫斯当代艺术机构的客房。

傍晚和陈侗吃饭，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项目的看法。他不太理解这个项目，当然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他的赞赏，而是觉得他不能给我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他是个学者，是个画家。

明天一早的飞机，飞回徐州，继续我的项目。

和徐坦谈到“仇庄项目”将来到美术馆展出，如果还原为一系列装置和常规的视觉形式的话，似乎把这个作品往后拉了回去。将一个在生活中发生过的艺术事件还原在美术馆里，必要性在哪里？是向美术馆妥协吗？美术馆是本着向它的公众负责的，艺术家向谁负责？我想，艺术家只能向自己负责。把发生过的事件作为材料和美术馆结合，再创作的可能性有多少？这是唯一的途径。美术馆成为新的材料加入进来，使作品产生新的可能，而不是简单的还原。所有的东西都只是素材，肯定有新的可能性。

星期五，2013年6月28日 晴

我睡了三个小时，早上没有赶上6:20的机场大巴，只好坐出租车到机场。飞机晚点两个小时，飞到连云港停留半小时，再飞到徐州。然后是中巴、大巴、出租车。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6:30了，舟车劳顿。

这一次出行，见了很多朋友，听到很多不同的艺术观点。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自己没有多少信心。我也对我正在做的项目减少了热情和信心，不像在村庄里那样信心满满。我知道，我依然有虚荣心，有欲望，有成功的野心。这些东西让我活得不快乐，不满足。只要不满足，只要有虚荣心，就不会真正地快乐。

回到村庄，干燥，喧闹。我的心和这个环境一样，一点都不安静。等做完了这个项目，我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地呆上一段时间。

## 6, HI HA HI HA……

星期四，2013年7月4日 雨

终于下雨了，接连几天的雷阵雨、暴雨……村子里的路又变成了河。  
钟鸣在拍摄汽车在积水的路面上激起的水花时，摄像机湿透了。我们把摄像机卸开，放在风扇边吹了一天一夜，才又组装起来，继续使用。  
父母把图书馆门口的玉米种上了，等着发芽。  
天气炎热，图书馆添置了两台落地扇。

星期六，2013年7月6日 晴

我坐在图书馆的大桌子上，桌子中间是一个切去瓶颈的塑料可乐瓶，里面插着一束快要枯萎的狗尾巴草。一群孩子在翻书，张茜茜在画画，四爷爷在读书。  
我感受着这些，我观察着孩子们翻书时的神情，尽管他们对书里的内容不一定理解，却流露出非常纯真的满足感。四爷爷翻看着谢德庆的《现在之外》，他不理解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却很认真的阅读着每一张图片。张茜茜在倒着临摹安迪·沃霍尔的“高跟鞋”，她的线条非常倔强和沉稳。  
图书馆对这个村子很重要，大家很需要这个图书馆继续存在下去。  
图书馆门前的玉米已经出芽了，一夜之间长出了5厘米高。

昨天杨高举和李森来安装约翰·考美林 ([John Körmeling](#)) 的灯光装置“HI HA”。其实这是我最先启动制作的作品，却因为技术和材料的原因拖到现在才开始安装。杨高举从事门面和灯光制作行业，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原作使用的灯光材料。最后，我让他用替代材料制作这个作品。我们选择了铁皮字，喷过漆后，在字的里面装上了闪烁的彩色LED灯带。乍看上去和原作很像，尽管这很“山寨”。  
HI HA 装置安装在商店对面王学义的房屋后墙上，挨着大路。这给商店带来一种喜悦的氛围。  
杨高举打算只收这个作品的材料钱，我说坚决不行，我打算付给他4000元。

昨天看到网站上一篇介绍仇庄项目的文章，题目是《一个山寨的 Van Abbe 美术馆》。确实是这样，当这些来自 Van Abbe 美术馆的作品被复制在村子里的时候，一个“山寨”的 Van Abbe 美术馆就形成了。这有什么不好呢？人们享受这些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这个项目真正花在作品制作上的钱并不多，一是选用相对便宜的材料，二是很多朋友和亲人帮忙，人工费也不多。看来钱都花在了作品之外了，正是作品之外的东西，构成了整个项目。

今天下午，杨高举和李森继续安装约翰·考美林的装置。天黑下来的时候，装置的灯闪烁起来。很好看，HI HA HI HA……闪烁的节奏有点快，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原作是怎么闪烁的。现在这个复制品，看上去和原作很像。当然，走近细看的话，还是很廉价和粗糙的。这些铁皮的文字用钉子钉在墙上，是一次性的，无法拆离这所房子。

星期天，2013年7月7日 晴

今天下午去图书馆附近的家庭送毛泽东像，我感到很多人并不喜欢这几张画。有人说家里的画太多，没地方贴了；有人说家里有耶稣像，不好再贴毛泽东像了；有人有些推脱和迟疑。当然，有些人愿意贴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而是不好意思拒绝我。

面对拒绝和推脱的时候，似乎工作有些难做，有些削减我的热情。可是，就是因为这样，问题才浮现出来。这是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间的碰撞和隔阂，而不是我和这里人的冲突。我要怀着一颗平和的心去询问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几幅画，接受和不接受，都需要真实地呈现出来。这种微妙的心理和看似平静的冲突，正是整个项目最有张力的地方。

约翰·考美林的“HI HA”晚上开始闪烁，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大家都说这个作品好看，同样表达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作品似乎没有冲突。越是人们喜欢的东西，就越是光滑而没有故事。

星期三，2013年7月10日 晴

天气炎热，什么都不想做。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商店老板王高启因为心情不好，卧床一个多星期了。我去看他，他说他拉肚子。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录像他也无暇顾及，停播了一个多星期了。我知道，一个对生活失去勇气和信心的人，是没有热情做任何事情的。他总是这样，遇到问题就卧床不起，少则一个星期，多则一个月。问题的症结在于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在村子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坚不可摧。人们可以忍受灾难、贫穷和愚昧，却不能忍受没有传宗接代的儿子。观念可以杀人，可以折磨得人生不如死。

索尔·勒维特的一幅壁画前面的两棵柿子树枝叶繁茂，遮挡住了大部分的壁画。王学义家里（老婆）在“HI HA”灯光装置前面搭起了人字形架子。用不了多久，地上种植的豆角就会爬满竹架，挂满豆角，也会遮住大部分装置。在这儿，当用来观赏的艺术和人们的实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艺术是要让位的。这样就能让他们和谐相处，反之则让艺术没有立锥之地。

下午送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像给卢道德，他收下了，表示能接受，因为安迪·沃霍尔没有把毛泽东变形。他说他打算把客厅中央的毛泽东像取下来，换上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像。

星期三，2013年7月17日 晴

我离开上海已经大半年了，我感觉到一种危险，我面临和现代文化隔离的危险。我需要特别警惕，我要认真学习。当我和城市切断了联系之后，我的艺术也就没有了和城市对话的可能。

星期天，2013年7月21日 雨

感谢那些在学术上和我意见不同的人，感谢那些和我争论的人，感谢那些在学术上攻击我的人。因为他们，我才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独立的精神，我才更加坚强。我想到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中的少年和那只孟加拉虎，因为危险时刻存在，少年才活了下来。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离不开这些和我不同和对立的人。

星期二，2013年7月23日 雨

中午邀了几个画友去县城看魏懿善老师，买了水果、牛奶和鸡蛋。敲门，没人应，打了电话才知道，魏老师到淮阴大女儿家去住些日子了。无奈，返回。

钟鸣说这些日子很无聊，没有事情可做。我觉得这是问题，没有布置工作，他就没有工作的驱动力。他最终是要自己和自己相处并工作的，他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村子里的路上依旧都是河流，因为前几天刚下了一场暴雨。约翰·考美林的 HI HA 装置前面的豆角已经爬得老高，挡住了大部分的装置；索尔·勒维特壁画前面的树木更加茂盛，几乎把壁画全部挡住了；图书馆门口的玉米和野草也长起来了，一片绿色。

村子里燥热难耐，一动不动，就是一身汗。我再次讨厌起这个地方来，真想把父母搬离这个地方，到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去，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去。

## 7, 55 个环形灯

星期五, 2013 年 8 月 9 日 晴

从上海回到仇庄的家里, 天气依然炎热。无论在哪里, 衣服都被汗水浸透。昨夜电闪雷鸣, 我从睡梦中惊醒。

钟鸣把丹·弗莱文环形灯装置的防雨帘设计成了大红色, 由我母亲用缝纫机制作出来。那么大一块红色, 像一面红旗, 合起来像一块幕布。我觉得这块颜色和作品很不搭, 作品是素雅的白色灯管, 而它的衣服也应该是素雅的。这块红色破坏了作品的安静, 等安装好后, 如果我还是觉得不好, 就要重新制作雨帘。

星期六, 2013 年 8 月 10 日 晴

一大早, 父亲就把我家门口将会挡住装置的玉米和黍子砍掉了。母亲制作了红色的防雨帘, 父亲把它安装在了墙上。天很热, 大家都大汗淋漓。王前进、李昌顺、王高启和父亲一起把丹·弗莱文的灯光装置从图书馆抬出来, 安装到我家的后墙上。插上电, 55 个环形灯亮了, 大家都觉得好看。父亲很得意, 很有成就感, 他满头大汗地处理装置上的细节, 调整灯的位置, 顺着墙角固定电线。九十多岁的赵连起爷爷拄着棍来看个究竟, 他连说好看, 凑近看了许久, 甩下一句话: “人真能!” 王前进拿着他的小照相机不停的拍照。学义家婶子看到这个装置后说: “还是你们家的这个好看。”她家墙上的 H I H A 装置被豆角架挡住了, 显得黯然了很多。我说: “没有关系, 等到秋天豆角架撤掉的时候, 你们家的装置就会重新好看起来的。”夜里, 55 个环形灯发出耀眼的强光, 照亮了路面, 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眼球。那块红色的防雨帘, 像一块红色的舞台幕布, 似乎这里是剧场。

我看着这个装置, 它离开了美术馆, 置身于一个充满着泥土、噪音、庄稼以及赤裸着上身的农民之间, 它有了新的活力。它和周围的环境很融洽, 成为一个新的景观。夜里, 这个装置经历了第一晚的风雨。

星期日，2013年8月11日 晴

昨天下午，来自加拿大的策展人杰西·布奇（Jesse Birch）和顾灵、路易、巢佳幸一行到访仇庄。

杰西因为要为《典藏·国际版》（YI SHU）杂志写一篇关于“仇庄项目”的评论而专门从加拿大温哥华来到仇庄，他说没有第一手的亲身体验，是很难写这篇文章的。他说不来也能写，但那是很不一样的。

我邀请顾灵从上海来做他的翻译。

天气炎热，他看作品看的很仔细，不时的记录并向我提出问题。他依次拜访并采访了卢道德、王高启、魏益明、樊敬思和我的父母。

晚上，我请他们到县城我表哥的狗肉馆吃了饭，并邀了杨高举一道作陪。

星期一，2013年8月12日 晴

天气炎热。

杰西一行的参观和访问在酷热中进行，母亲在厨房为大家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辛苦可想而知。

下午，我托我的仁兄弟二哥把他们送到徐州火车站。

哈利躲进一个旮旯里，生了6只小狗。

星期四，2013年8月15日 晴

昨夜梦里出现两次旧房和大楼的垮塌，惊心动魄。第一次无人伤亡；第二次大楼倒塌的时候，一个华贵的音乐会正在进行，人们被瞬间垮塌的大楼吞没，我去洗手间的间隙被人推出，躲过一劫。

立秋9天了，天气依然酷热难耐，以往这时候，夜里都有点冷了。这是一次80年未遇的酷热的夏天，所有人都在抱怨中忍受着炎热。



星期五，2013年8月16日 晴

图书馆门口的玉米长得很高了。

我很多天前就找来源和他师傅孟现平帮我制作玉米的围栏，可是他们一直在工地上忙，没有时间。今天，他们忙完了工地上的活，开始帮我制作围栏。

他们先是把制作好的金属方管焊接起来，形成框架，最后在外围附上一层白色的铁皮。用水泥把围栏的几条腿固定在土里，就完成了。

钟鸣拍摄他们电焊的时候，四射的火花溅在镜头上，把镜头烫坏了。幸好他使用了广角镜，我们广角镜卸下来，继续拍摄。

因为上次请他们制作了索尔·勒维特的作品，孟现平坚持说这次是帮忙的，只收了600块钱的材料钱。我过意不去，就另外买了一条烟送给他们。

星期天，2013年8月18日 晴

父亲觉得我们养不了哈利生的那么多小狗，又送不出去。就扔掉了4只，留下了2只小狗。我问他扔哪里去了，他说：扔到干涸的河里了。

## 8, 萨莉和梦龙

星期二, 2013年8月20日 晴

这两天, 随着夜里一阵西北风, 天气开始凉爽了, 有阵阵的微风。今年的夏天, 时间太长了。

或许是天气炎热的原因, 来图书馆看书的孩子不多; 或许是长久没有活动的原因, 就对孩子没有了吸引力了。重复一个东西, 相对容易; 而不断推陈出新, 是有难度的。图书馆是什么? 图书馆是一个窗口, 是一个公共空间, 是电影院, 还是……。还有各种可能性, 它是餐厅, 它是剧场, 它是美术馆。图书馆的活动不局限在图书馆之内, 而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星期二, 2013年8月27日 晴

萨莉 (Sari) 和梦龙 (Munro) 从澳大利亚来到仇庄, 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情和善良, 这在中国人的眼神里, 已经很少看到了。他们来拍摄纪录片, 计划在这里拍摄两个星期。我的朋友邬晨云也从上海过来, 帮忙做翻译工作。

星期四, 2013年8月30日 晴

这几天, 天气终于凉爽下来了。风是从西北刮过来的, 妈妈说这意味着再也不会炎热了。

萨莉和梦龙, 一对儿, 真的很友善和可爱。小邬来做翻译, 她非常专业。

萨莉在前两天都没有拍摄, 只是跟着我到处走, 到处看。她说她不是计划型的人, 她要根据她的感觉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今天上午她采访了魏老师, 我看着他们做好准备工作, 就离开了。我希望魏老师能因为我的不在场而说出一些更真实的话。萨莉负责提问和录像, 梦龙负责录音。也许是因为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 魏老师很认真地完成了采访, 大家都很满意。魏老师说我的仇庄项目就是在村子里栽了一棵梧桐树, 树逐渐长大, 村子里的人到树下乘凉, 同时梧桐树也从外面招来凤凰。

有外面的人来到村子里看这个项目，他们是一面镜子，我通过这面镜子看见自己。长时间呆在这儿，无论思维还是行动就会处在一种惯性中，一旦这样，我的工作就会毫无创造性，只是简单的重复。钟鸣也是这样，思维和行动都容易进入惯性，这使人像一块木头一样，不灵动，不智慧。

一阵倦意袭来，我有点熬不动了。

昨天晚上梦到在教室里，有个陌生人拥抱了我，我就神差鬼使般地跟着他离开教室。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一度找不到我的教室，找不到我的课桌。终于找到了，上面凌乱且落满了灰尘。两个姐姐看到我就很悲伤，因为我已经失踪了十年了。突然，我再次看到那个陌生人，似乎是一个怪物，我惊恐地指着他，“出去，出去……”。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招待萨莉和梦龙浪费了时间吗？

星期六，2013年8月31日 晴

上午萨莉采访卢道德，面对这样正式的阵势——刺眼、灼热的灯光和伸到他头顶的录音设备，他显然不太适应。我提前告诉他不必紧张，他说他什么也不惧怕。可是，对于总是滔滔不绝的他，在采访中却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甚至总是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多么意外的一件事，一刹那，我觉得有些失望，这是一次“失败”的谈话。

在问及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时，他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他带领人民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就是沉默。中途休息，我问他：“大爷爷，平时你对毛泽东有很多不同的评判和思考，现在怎么不说了？”他说：“在外国人面前，我怎么能说我们领袖的坏话呢？”

下午采访图书馆的几个小孩子，她们面对镜头，非常紧张和窘迫，显然，这也是一次“失败”的访谈。对于这些孩子，能够坐在聚光灯前面，似乎已经需要莫大的勇气了，更不能奢侈地要求她们自由地对着镜头表达自己了。似乎，我已经预感到会是这个结果了，可还是让她们接受这次不“成功”的采访。我知道这将是她们人生中重要的体验，不管以后她们在哪儿，做什么，都会对她们有所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语言表达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她们私下里像麻雀一样叫个不停。她们需要更多的机会来训练自己表达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情感。

明天采访一向不爱说话的张茜茜，希望能有奇迹和欣喜出现。

下午图书馆来了很多孩子，像一个幼儿园。非常吵闹，一天下来，累极了。

星期天，2013年9月1日 晴

我把张茜茜的画贴在一面墙上，作为采访的背景。那些画真的很好，你会想不到这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的画。为了不让张茜茜紧张，梦龙支好了录音设备就和我一起出来了，人少了，能缓解她的紧张情绪。

通过这些采访，我意识到以后我需要和孩子们有更多的沟通，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他们，这是表达的机会。我们在生活里缺少这样的表达机会，当我们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父母只是希望我们听话，却从来不鼓励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并用语言表达自己。

萨莉中饭时问钟鸣是否可以录制他读他的日记，我想大概萨莉也感到和钟鸣交流的困难。不会表达，很大程度上和他思考得太少有关。思维的懒惰，是非常可怕的。

星期四，2013年9月5日 阴

萨莉来到仇庄，用惯常的方式来采访孩子和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村民，显然效果不好。当他们面对正式的采访，面对一个外国人，面对刺眼的聚光灯，就很难表达出真实的自己了。他们喜欢用唠家常的方式来谈话，不喜欢探讨过于严肃的问题。

我对钟鸣说：我们拍摄的是时间，而不仅仅是事件。我们拍摄时间的流淌，而非事件的戏剧冲突。只有我们自己感受到了时间的流淌，才能用录像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并呈现给观众。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理解我的话。晚上我们重新观看了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在这部电影里，我被侯孝贤的“时间”深深打动。

我们又看了一段贾樟柯的《站台》，很明显，这部片子拍的过于死板，设计感太强，不像侯孝贤的电影那样，是流动的。

因为梦龙和萨莉的到来，父亲很高兴。他是一个对新事物有好奇感，并且很好客的人。他每天教梦龙说几句中文，看着梦龙笨拙的使用筷子的样子和他奇怪的中国话，他总是笑得前俯后仰，甚至会把喝到嘴里的可乐喷出来。

梦龙和萨莉非常礼貌，每天晚上都向我的父母表达他们的感激并互道晚安。

星期五，2013年9月6日 阴

很多天没有下雨了，空气中到处都是漂浮的尘土。道路两边的植物都覆盖着厚厚的尘土，图书馆门口的玉米也是这样，看不见绿色。我一度为此懊恼，因为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和录像都很难看。可是这不是现实吗？这不也是风景吗？尊重存在的一切，观察、体验它们。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傍晚，我完成了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条纹画，我把它画在图书馆门口玉米地的围栏上。

不时有大货车从我身后驶过，尘土飞扬。我用刷子在白色的底上画上黑色的条纹，黑和白都是8.7厘米，这是丹尼尔的条纹画的标准尺寸。我重复这一简单的竖条，像是禅修一般。我试图让我的心专注于我的刷子上，可是却很难做到，因为我的心总是不知不觉的离开了。画好后，一些人聚集在图书馆门口观看。

萨莉问我为什么选择丹尼尔的条纹画来复制，我说因为他画了一辈子条纹，而人人都能画出这样的条纹画。当然，我画出的条纹和他画的条纹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喜欢这个艺术家，他的画又是容易复制的，所以我选择了他。条纹画作为围栏，有了实用性。也给这个灰突突的环境增加了一点对比分明的视觉元素。

星期天，2013年9月8日 雨

大姐（袁建玉）和她的好朋友老薛从海门来仇庄看我和我的艺术项目。他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汽车，大姐晕车晕得厉害。

他们看到路边的艺术作品时没有表露出太大的兴趣，也不知道该怎么阅读。他们对这些西方的艺术一无所知，对这个村庄的环境也一无所知，看到这些艺术作品在这个环境里，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对于这里的村民就不一样了，一方面这些艺术像一个入侵者一样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改变了一贯以来的村庄环境，所以他们会对这些艺术好奇并讨论。

希望任何时候，我都能做到“do my best”，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我希望自己是水，柔软的，清澈的，透明的，对什么都是无所畏惧的。

我要把工作和休息时间分开，不要说过多的话，多做少说。

一直要警惕自己的懒惰、贪婪和愚昧。

桌子长期不擦，灰尘就会越积越厚，自然就难擦干净了。可怕的是，久而久之，对于灰尘习以为常了，生活在灰尘中，也感觉不到不舒服了。

星期一，2013年9月9日 雨

下了一夜的雨，把路边植物上的灰尘冲洗得干干净净，图书馆门口的玉米也干净了。可是村里的路依旧变成了河流。一阵秋雨一阵凉，夜里要盖被子才能睡觉。

一阵风，就把树上的叶子吹下来许多。周围的风景变化很快，几天的时间，或者一阵风，一场雨，就足以把风景换一个样子。我需要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这些微妙的变化，它们很细腻，很丰富。经常，我们只是知道又要更换暖和的衣服了，却忘记了享受季节的变化带给我们的风景。

星期二，2013年9月10日 阴

昨天重看了纪录片《寿司之神》。这是一部很棒的纪录片，看完整部电影的感觉就像吃了二郎的一次寿司大餐——简单，但是丰富极了。我把二郎做寿司和我做艺术相互参照，我觉得二郎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而我的路还长着呢。做一个寿司大师和做一个艺术大师的道路是一样的。二郎说，要想做出美味，必须自己是个好的美食家，吃过美味，知道什么是美味，然后才能为顾客做出美味来。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看到过好的艺术，才能创作出打动观众的艺术作品来。

我对钟鸣的工作很不满意，我再次怀疑我的选择。六、七个月过去了，他在拍摄方面依然被动，没有感觉。我形容他像一把锈迹斑斑的刀，我必须花很长时间磨，才能使用。他像一个沉重的石磨，推一下他才走一下。我真想让他走人，我自己来拍摄。他不但懒惰，而且没有知识，没有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在，我付工资并且来教他所有的工作方法。

我把我的感受和想法告诉了他，我想我应该让他知道他的问题以及我的不满意，哪怕这让他很不舒服。我说，我会让你做完这个项目，如果你真的学到很多并且具备了从事这份工作的能力，我会很欣慰；如果到最后你依然没有改变，那我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你浪费了一次机会，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慢慢感觉到，我开始走上一条孤独的道路。

星期五，2013年9月13日 雨

接连几天下雨。

萨莉和梦龙昨天下午走了。临走之前，他们送了一些礼物给我们，有孩子的，也有成人的。这和中国的习惯很不一样，通常我们会在见面的时候把礼物呈上，这样会给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方便；而他们却是在离开的时候再送礼物。

最后几天，父母有些不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在这里吃住 17 天，不付钱，却一点表示也没有。母亲说如果他们下次再来，一定要收钱。

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如何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却不懂得这些，他们的思维很简单，面对热情的招待，不知道如何表达谢意，不知道如何回报对方。

母亲把两个外国人用过的床单和被罩拿到家里来洗，一边洗一边抱怨：全是毛，到处都是毛。我笑说：这是人种的不同，你要容忍人家长很多毛。

星期六，2013 年 9 月 14 日 晴

想起我三姨，她随姨夫从农村搬去了大连，生活在城市里。每次回来，她都打扮得干干净净，很大方地送钱给每个亲戚。每到春节，就会寄钱给我们这些亲戚。我们都以为她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一定很有钱。在她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赶到大连去看望她。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真实的生活。她没有多少文化，到了大连之后在大街上扫垃圾，捡垃圾，在建筑工地上搬砖，一家人住在二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省吃俭用。她就是这样艰难地把钱省出来，然后大手大脚地送给我们这些穷亲戚。我看到她家的暖气片上放置了一排装满了水的大雪碧瓶，这样就可以得到洗脸洗脚的温水；厕所里的水龙头永远都滴滴答答地滴水，她用一个桶接着，这样流出的水就不会跑水表。很遗憾，我以为她生活的很好，就不去大连看望她。直到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才站在她身边。

星期三，2013 年 9 月 19 日 晴

明天中秋节，我在网上买了 4 盒月饼，一盒送给小石，一盒给二姐，一盒给魏老师，一盒留给我们自己吃。另外买了两盒贵一点的月饼，一盒送给芳芳，一盒送给我大连的姨夫。节日是个感恩的好机会，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慷慨，就给别人带来快乐和温暖，何乐而不为呢？

昨天去大姐家，回来晚了，路上就着凉了。昨夜凌晨三点开始不能入眠，今天晚上开始发烧。头重，无力，晕乎乎的。

## 9, 离开村庄的一段时间

星期五, 2013年9月27日 晴

凌晨醒来, 难以入眠。

星期天, 2013年9月29日 阴

克里希那穆提说, 只要对成功还抱有幻想, 生命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我, 一直幻想着自己的成功。

星期六, 2013年10月5日 晴

我在村子里开始了一个艺术项目并且结束, 如果我不曾拍照和录像, 甚至不曾用文字记录下任何东西, 那么, 艺术项目还在那儿吗? 如果说一个艺术家需要用照片或者其他媒介生产出可供再次展示的作品是一种工作需要, 这种需要是必须的吗? 是可以改变的吗? 现在, 我们不记录, 就是说让艺术不留下物质的东西, 只是非物质的存在, 那么,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吗? 针对物质化的非物质化, 是否也显得刻意? 那么, 刻意的不记录和记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记录本身是否可以开启一种创作行为? 记录就是创作, 记录并非复原发生的和发生过的艺术, 而是寻找另外一种艺术的可能, 也是思考的过程。

读克里希那穆提: 若想为当今文化及社会结构带来根本的改变, 我们就必须换上崭新的意识和截然不同的道德观。……每个人都必须点亮自性之光, 这份光明就是律法, 此外别无律法了。点亮自性之光意味着不去追随他人的见解, 不论它有多么恰当、合乎逻辑、富有历史性或是具有说服力。如果你正站在某个权威、教条或结论的阴影中, 你就无法点亮自性之光了。“解脱”指的就是点亮自性之光。真正的解脱乃是从依赖、执著、渴求经验之中解放出来。从思想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便是点亮了自性之光。



星期天，2013年10月6日 雨

我意识到我在日记里只是记录了一些片段的感受，而很少描述事物的细节。我只是凭着兴趣记录一些事情，而没有把它作为记录这个项目的手段，因为我总是回忆起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和场景，却没有出现在日记里。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就懒得书写了。是我觉得一些事情不够大，不够特别，不够深刻，所以不去记录，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似乎，对整个项目的记录也是这样，不全面，支离破碎，漏掉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几件事可以补上：1，我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我放学回到家里，听到邻居家传来了哭声，哭得悲痛不已，哭了很久。我知道，那是因为王高启没有考上大学，而家里的贫穷又不允许他复读（父亲决定把家里仅有的钱给他哥哥娶媳妇），所以他才哭得如此悲痛和绝望。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萨莉，过了一天，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被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2，自从萨莉和梦龙来到仇庄，王高启就寻找机会和他们用英文对话，他把当年的英语书找出来，晚上学习一些单词，白天找他们两个对话。这让周围的人很吃惊，居然一个农民可以用英文和外国人对话。显然，王高启找到了自信，每天，他都很开心。3，这几天是秋收的季节，王高启再次卧床不起，所有的农活都由燕柳婵子一个人来完成。燕柳婵子说因为她提及他不能为母亲帮忙开车拉玉米而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就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无能。之后，就睡下了，不再起床。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大家对他的卧床早就习以为常了。

读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话：不具名的创造性。我们都想变成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政治家、歌唱家等，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自己眼前所做的事都不喜欢。如果你真的爱唱歌、画画、写诗，你就不会去考虑出不出名的问题。……你知道，收敛你的光芒，让自己变成一个无名氏，爱你所做而不炫耀，是非常美好的事。

星期四，2013年10月17日 阴

文化殖民。我想那一定是一种手段，背后有政治或者经济的目的；一定是强势面对弱势，不平等的；不怀好意的，不是建立在帮助对方的基础上，而是怀着某种恶的意念，达到自己的另一种目的；对方是会随着时间被改变和异化的。

仇庄项目将西方的艺术带到中国一个偏僻的村庄，如果将它定义为一次文化殖民的话，那么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将是文化殖民。在学校里向学生讲述西方的文化和艺术，在美术馆做西方的艺术展览，输送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出版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书籍。仇庄项目和这些文化交流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是仇庄项目传播文化是免费的，是一个艺术项目。

纠结于文化殖民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重要的是透过这个项目，我们得以通过这些艺术作品看到一个村庄，看到村庄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当然，研究村庄有很多种渠道和方法，仇庄项目只是我感兴趣的一种方法而已。

星期三，2013年10月23日 晴

我意识到一种变化。上半年我在仇庄做项目的时候，我的心里惦记着城市，总是希望能多往上海跑，多参加一些展览和讨论，担心在仇庄浪费太多的时间而与世隔绝；这段时间，我身在城市，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仇庄，很想尽快回到那里去，似乎只有呆在那里，心里才踏实。

到现在，我意识到之前的10个月，我根本没有了解这个村庄，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很好的记录这个村庄，我们只是拍摄路边上能看得见的事物，而不能拍出村庄的灵魂。现在，我忽然觉得什么都值得拍，值得观察，值得记录。那么，就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了。仇庄项目不仅仅是那些来自西方的艺术品，更多的是关于这个村庄的内容，以至于我无法分辨哪里是我的作品，哪里不是作品。

我意识到今天的村庄很不平常，农民不热爱土地和种植庄稼，他们想尽可能地摆脱这些繁重的劳动，他们不得已才在田里劳作。现在，大家在田里劳作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种和收，使用的是大型播种机和收割机，人们不像上一代人那般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像祖先那般了解这些土壤和庄稼。当然，这样就毫无劳作的快乐而言。

村子里要修路，很多户人家面临拆迁。可是政府却连基本的通知和商量都没有，径直派人来测量。接下来就是通知你赔偿的标准，限令搬迁的时间。农民没有反抗和质疑，能做的仅仅是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多搭建些临时建筑，以获得多一点的赔偿。我想，农民对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不会有过多的留恋，只要求多一点的赔偿金以及安家的费用。住在哪里不重要，只要不受穷，怎么都好说。除了那些现实的利益，人们还在乎什么？

效率，所有人都在拼命以获得最高的效率，效率就是金钱。大片的庄稼地被改为工厂和作坊。人们养殖鸡、鸭、猪、羊、牛，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不断增加激素和化学药物，和它们没有情感的交流。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人们因为追求效率而失去了和土地和动物和环境之间的情感。

农耕的文明已经在村子里消失了吗？还是行将消失？

星期二，2013年11月5日 晴

写给钟鸣。

前天读小川绅介的《收割电影》，他告诉他的摄影师田村：不论是拍虫子还是拍花草，一个镜头至少要用三十秒。他经常对田村讲：要培养聚精会神地观察事物的能力。

这段时间我不在村子里，就总是想着我们这大半年来的工作。时间长了，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在重复地发生着，而我们的摄像机也总是因为拍摄过某个场景而不做重复的拍摄，我们也容易觉得经历过这些事物而对重复的事物失去了兴趣。可是，仔细想来，我们努力强调的“时间”不就是在这种重复中体现出来的吗？看似重复的事物，又有哪一件是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呢？所以，我们要把镜头对焦在这些重复的日常生活中，拍摄重复，我们用镜头仔细观察每一次重复中的细微的差别。如果感受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差别，我想我们就真的拍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很高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同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也总是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回到村庄，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这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艺术作品吗？我为什么还想继续留在村庄里开始下一年的工作？是什么吸引了我？

日日是好日，愿和你一起学习、进步。

## 10, 寒冷的冬天

星期二, 2013年11月19日 晴

回到仇庄已经好几天了, 一天天过去, 什么都没有做。

我离开的时候是秋天, 当我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这寒冷的冬天让人感到不适, 我还像往年那样, 手脚冰凉。我担心我的冻疮会再次发生, 我知道唯一能抵御冻疮的行动是锻炼身体, 当然还可以选择离开。

树上依然有些枯黄的树叶, 这是秋天的尾巴。村子里依然整日尘土弥漫, 特别是大车经过的时候, 我总是在路上掩鼻而行, 不过这也无济于事。

我和钟鸣去县城的鸟市拍摄了父亲卖鸟, 我在远处观察着父亲在人群中的一举一动, 看着他斑白的头发和日渐苍老的身躯,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酷, 很大气。我想, 我身上的大气一定是来自于他。

李昌顺家的藏獒被人用毒针射死了, 这只总是对着行人吼叫的大黑狗居然会落个这种下场。

李昌顺很伤心, 他说他是不会吃一口狗肉的。

攀登是个爱吃的人, 他乐呵呵的买了这只死狗, 剥了, 邀了几个朋友在晚上吃掉了。

对于这儿的人来说, 仇庄就是一个世界。他们所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是以这个村庄为依据的。

老同学“香油西施”的香油作坊开张, 请同学们一起吃饭。吃饭是个很无聊的事情, 因为喝酒, 彼此没有真正的交流; 因为吸烟, 整个环境是污浊不堪的; 因为过多的食物, 影响人的健康。看看昔日的同学都日渐苍老, 他们的孩子多是二十岁上下了。只有我, 还不曾是个父亲; 只有我,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谋生的职业。

星期五, 2013年11月22日 晴

钟鸣的进步很大, 他的录像拍得很稳, 遇事沉着。我很开心能看到他的成长, 回想年初他刚来到仇庄, 还不会用摄像机, 不会和人说话。而现在, 他在村子里到处拍摄, 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 他可以自由地和人交流。

想象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想象力。失去想象力的作品会陈腐而味寡。当然，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想象力。

索尔·勒维特壁画作品前面的树叶已经凋零，只有几个橘黄色的柿子挂在树枝上。诗童和诗轩总是在墙画前面玩耍、爬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这幅画很美，但是我看到他们在墙画前，就觉得这风景很美。

约翰·考美林的“HI HA”前的豆角已经没有了，主人重新夹了个整齐的园子，在里面种了青菜和大蒜。HI HA 像是获得了新生一样完全展露出来，不停地闪烁着。在夜里，我看着闪烁的HI HA，真的给村子里增添了节日般的活力。

父亲不怎么舍得打开丹·弗莱文的灯光装置，因为它太耗电了。常常，他忘记打开，我觉得他是故意忘记的。这时候，不是我就是钟鸣会把插头插上去，让这个装置亮起来。可能是天冷的原因，有两只灯管已经不亮了。

图书馆门前的玉米已经收获了，玉米结得很小。干枯的玉米秆和叶子都被后面扎纸罩的三爷爷拿去喂羊了。母亲在丹尼尔·布伦的条纹画的围栏里继续撒了小麦种子，又在上面种了很多大蒜。因为小麦种子没有拌农药，就招来了很多麻雀，每天都在地上挠啊挠的，把小麦都吃掉了，泥土被翻了一遍，大蒜瓣就暴露在外面了。

我觉得理查德·朗的树枝装置应该放置在村子外面，这个装置需要广阔的自然空间。我在村子东面的河边发现一片空地，紧邻着复新河，这是个很好的地方，视野非常开阔。可以考虑实施这个作品了。

星期六，2013年11月23日 雨

下雨了！

路上重新变得泥泞起来。两天的大雨过后，天气将进入新一轮的严寒。

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村庄变得丰富起来，鲜亮的色彩给这个灰色的村庄增添了温暖和活力。

人们总是以你拥有多少可见的物质财富来衡量你的价值。村庄里人也是这样，不管你有多少学问，多么有教养，如果你没有积累财富，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只要你贫穷，你就没有价值。可以想见，我的父母因为我的不成功而在心理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痛楚。

一大早，我还躺在被窝里，母亲坐在我床边，有些责怪地说：“你一直拖着不要小孩，拖到现在还没有小孩，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只是为你担心。”我能说什么呢？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安慰不了她。

父亲不顾他的心肌梗塞，不听医生的劝告，抽烟越来越多，每顿饭都吃的很饱。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看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不管发生什么，只好各自承担了。显然，他不了解我的艺术，他说他看不到我的工作价值，不断地说等到了春节就把图书馆关闭吧，下年不要再开了。

我回家创作，家人给了我便利和帮助，同时也是我最大的障碍和干扰。  
窗外，雨声淅淅沥沥。

星期一，2013年11月25日 晴

左手开始出现了红斑，这是冻疮的开始阶段。似乎，在我的皮肤下面沉睡着冻疮细菌，它们是沉睡的军团，一旦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就开始复活了。不管你保护的多好，都阻止不了冻疮军团的复活。

我打算用运动来对抗这复苏的军团。

到了严寒的季节，我会产生逃离这里的念头。屋子里甚至比屋外还要冷，整日门窗都是开着的，不生炉子，没有暖气，人们穿上最厚的衣服，冻得缩成一团，或者早早地钻进被窝抵御寒冷的冬夜。看来，除了被窝再也找不到暖和的地方。想起我小时候的冬天，我满手满脚都是冻疮，那是痛苦的回忆。我知道，我要逃离这儿的原因之一肯定是自然环境恶劣，我觉得我的身体在这里不被尊重，我幻想着一个生活舒适的地方，我坚信有这样的地方。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儿的环境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人们依然生活得像猪一样，在肮脏和恶劣的环境里呼吸和劳动。其实，这比过去更肮脏，因为环境被破坏的更厉害，到处都充斥着肮脏的垃圾。不过，这儿的人似乎非常适应这儿的环境，没有人向我谈论这种肮脏和恶劣，人们似乎生活的很快乐，或者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我小时候不适应，现在依然不适应。

晚饭的时候，父亲开始盘算着图书馆关闭后怎么来处置那些桌子和椅子，他说图书馆再开下去意义不大了，因为我的项目快要完成了。的确，他看到我一直在花钱，却看不到我挣钱，他没有耐心了。我想，他和母亲一样都为这个项目付出很多时间和劳动，他们都有忍受不了的一天。如果他们忍受不了我呆在家里，我真的无法继续下去了。

或许，我应该在春节后关掉图书馆，离开村庄。等我挣到一点钱，再回来。

或许，我应该在春节后关掉图书馆，离开村庄。因为我建立图书馆是因为村庄里的人们不需要图书馆，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图书馆，他们怀疑图书馆的作用。现在，人们都接受了图书馆，似乎图书馆就是村庄的一部分，孩子们对我说他们离不开这个图书馆，人们知道了图书馆的重要性。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关掉图书馆了。

在我的本能里，我不想被道德绑架，我不想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情理上，我应该继续开图书馆，似乎这样会对村庄更有帮助。可是，我警惕情理性的行动，我希望我的行动更有突破性。

或许，我应该在完成《仇庄志》后关闭图书馆。

看，我多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没有什么是有突破性的，我的左脑在用理智和经验分析和指导我的行为。我应该听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想关闭图书馆吗？我的心告诉我：不想。那么，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图书馆一直在这里。

父亲的参与意识很强，我不应该受到他的干扰。图书馆应该继续下去，我要想办法让图书馆继续下去，哪怕我不在村子里，图书馆也要存在。我不是常常说因为有了限制才有创造性吗？那么，现在限制来了，怎么解决问题呢？

人情和世故已经完全占领了我父亲的整个人，而我还没有被占领，我不会被人情和世故左右。

我要听一听我内心真实的声音。

图书馆做的活动太少了，似乎只是做了一次野餐，就再也没有做活动了。没有活动，图书馆的活力就没有了，没有多少新书进来，来的小朋友就越来越少了。是我太懒了，没有在上面动脑筋，没有行动。什么都不做，最容易；做点什么，总是很难。

没有人督促，没有人带领，我的惰性就变得很强，就做的很少了。而钟鸣又是一个没有多少热情的人，因而更加懒惰了。

星期二，2013年11月26日 晴

早晨，泥泞的道路都冻成了硬块，盆里的水也结成了冰。

图书馆的邻居樊敬义大爷，一个因半身不遂而整日坐在门口的老人，他总是绝望而大声地咒骂伺候他的老婆。那个大娘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回骂并且煽他的耳光。我能体会大娘的苦楚：受了他一辈子气了，如今不但要承担所有田间的劳动、伺候他还要挨他的骂。现在他不能动弹了，就能用行动反抗他了。可反抗之后，还要帮他大便（大不出来的时候要用手给扣出来）、擦屁股，穿衣脱衣，做饭，还要出去干活。他们的大儿子樊建50岁了，因为贫穷而没有找到老婆，在县城里做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赚钱，维持家庭的开销和为父亲看病。目睹着他们吵架，我无法架起摄像机拍摄。

于吉打来电话，邀请我在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做个表演作品。做什么呢？我一直觉得我不会做行为表演，可是我这样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说：你把表演的概念给经验化了，因为一切都可以是一场表演。重要的是你思考什么，而不是表演什么。

我脑子里总是呈现一句话：讲台即舞台。

讲台即舞台，我觉得我们的讲话也是表演，并不是要有肢体的运动才是表演。已经发生过的一场谈话是否可以重现呢？比如：我和那颖禹在仇庄发生的一场谈话，是否可以由另外两个人在上海重新表演发生一次呢？这样的话，只要我们提供谈话的脚本，我们的对话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而我和那颖禹本人都可以不在现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数次的重复一些重要的谈话，观众一直能听到现场对话。

星期三，2013年11月27日 晴

刮了整个后半夜的西北风，把树上顽固的叶子撕扯了下来，满地都是。母亲半夜里听到大铁门被大风吹得叮当作响，担心房子后面灯光装置的防雨布被吹飞，就起来将防雨布的几个固定点重新绑了一下。

父亲说将树枝装置摆在村外，很难保存，过不了几天会被人当柴禾偷走。如果摆在自家的田里，能摆得久一些，最后柴禾还是自己的。我感激着他的好意，心里还是觉得应该摆在村外河边上，一来那里的风景比较好，二来作品时刻有被偷走的危险性。摆在自家田里是可行的，可是却太安全了。如果过于安全，我觉得不够刺激，就没有意思了。

卡尔·安德鲁 (Carl Andre) 的 25 块钢板装置是否可以放置在我家的院子里？

星期天，2013年12月1日 晴

我从南京参加展览回来了，村庄里依然泥泞不堪。钟鸣跟着我去了南京，我能感觉到他对大城市的陌生、好奇和拘谨。可是一回到仇庄，他就变得自信和坦然起来，走路的姿势都变得不一样了。

星期三，2013年12月4日 晴

二姐去了叔叔家看望叔叔的孙女宇潼，而父亲希望我们都不要和叔叔来往，他因此对二姐大发脾气。二姐和父亲吵得很厉害，并且愤然离开。

春节后叔叔的二儿子海涛要结婚，父亲希望我们都不去他家吃饭，这样以解他对叔叔的心头之恨。而我和姐姐都觉得应该去参加婚礼，父亲则更加生气，他放了狠话：如果你们去他家参加婚礼并且吃饭，我就会喝农药自杀。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心胸狭窄，度量小的像芝麻粒（母亲常常这样说），大男子主义，霸权，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我觉得他和叔叔多年的恩怨不应该牵连到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和叔叔家的两个孩子关系都很好，我们和叔叔的关系也很好。我们都是四十多岁并且有自己家庭的人了，我们应该能为自己的行为做主并且负责，而不应该再受父亲的控制。这一次，我要鼓励两个姐姐做她们愿意做的事情，不要被父亲狭隘的思想左右。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以为我有能力可以和他和睦相处，现在看来，我依然受不了他，并且不能纵容他为所欲为。



星期六，2013年12月7日 雾

早上起来，大雾。

李太金叔叔晚上到图书馆来找我，他去上海看他女儿的时候，带回来两幅油画。这是两幅很一般的油画作品，对于他，像是带回来两件宝贝一样。我说画得好坏不重要，你喜欢就好。他家里，酒瓶和日用品摆满了索尔·勒维特的“墙上结构”，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就贴在架子的旁边，现在，他要把其中的一幅油画也挂在架子的旁边。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忙着上班赚钱，新房子还没有装修。看来，索尔·勒维特的墙画要到明年才能画在他的客厅里了！

王学义和他的女儿发生了矛盾。女儿上高三，就要考大学了。王学义靠搬木头装车赚钱，很累。他抱怨女儿花钱太多，女儿敏感，生气了。他就火冒三丈，把电饭锅以及锅里的饭菜都扔在院子里。女儿不吃饭，只是委屈地哭。

王高启对我讲述了他对命运的无奈，考大学落榜想继续复读，可是父亲却要用仅有的一点钱给哥哥娶媳妇。那时候，父亲在两难之间拿着药瓶，差一点喝农药自杀。他说他争取了，可是命运却不允许他继续读书。那时候，家里实在太穷了！

星期天，2013年12月8日 阴

我的工作效率很低，一天天过去，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身体里有两个我，一个是要有出息，要有成绩，要成功；另一个是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做喜欢的事情，无所谓成功，世界是自己的。两个我不时地在我心里博弈。

成功是什么？一辈子过得悠游自在，不追逐名利，不就是成功吗？成功是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一直坚持傍晚去河堤上遛狗，快走。这样就可以抵御寒冷的天气。

星期五，2013年12月13日 晴

《中国周刊》的记者焦东雨要报道仇庄项目，他打算报道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在村子里的状况，他说这样有故事性和政治性，符合他们杂志的风格。

下午在丰县城里采访了杨高举。焦东雨和杨高举面对面坐着，谈论着，我在一边倾听。他的采访风格是松缓的，一会儿谈论艺术，一会儿谈论生活。杨高举说他本来打算今年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前完成一幅油画，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形象汇聚在一幅大的油画里，可是因为拆迁盖房，这个计划就搁浅了。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素描草图。

乐大豆下午来电话，他说已经和查尔斯确定仇庄项目参加明年的圣保罗双年展，查尔斯是这一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另外，他说蒙德里安基金会打算支持仇庄项目，还有意大利和英国伦敦的两个美术馆有意向在2015和2016年做仇庄项目的展览。

我对于项目完成之后随之而来的展览机会并不惊喜，好像还有一点担忧，担忧我没有能力完成一系列的展览，担心我驾驭不了大的展览空间，担心我会因为展览的机会而失去自己的节奏和独立性。这时候，我想起了谢德庆、顾德鑫，他们的独立精神和人格是一面镜子，我随时都要照一下自己。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提醒自己不要被机会和利益吸引，我就能保持自己的工作节奏。

星期天，2013年12月15日 晴

焦东雨是个不错的记者，他的采访往往从很细小的事情问起，像拉家常一样，没有逼问，没有套路，却不失他自己的态度以及追问。尽管他对艺术了解不多，可是他有一颗敏感的心和勤快的大脑，依然能做出很特别的采访。

这次，他采访了杨高举、我父亲、卢道德、我、孙光法、钟鸣和魏老师。我很期待看到他的文章。

下午经过毛泽东像的时候，我们发现中间黄色的那张画被人戳了很多窟窿，都戳在毛泽东的脸上。是谁要和毛主席过不去？还是要和我过不去？我问在商店门口聊天的王高启，他说：“刚才有两个小孩用棍子在毛泽东的脸上乱戳，我吼了一声，他们就扔下棍子跑了。”我问：“是哪两个小孩？”他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孩，不认识。”

看到孙光法收藏的毛泽东画像和像章，看到杨高举画的毛泽东像，我想到其实我们可以在图书馆举办一个关于毛泽东的展览，展览由安迪·沃霍尔的三幅画、孙光法的收藏和杨高举的绘画构成。

星期一，2013年12月31日 晴

上海。

我和那颖禹在上午艺术空间的现场表演似乎不错。整个空间由三个元素组成：1，墙上的液晶电视播放仇庄项目的图片，一共480幅图片。2，我和那颖禹面对面坐在展厅靠近中央的位置，两听啤酒，我们谈论仇庄项目中的收入和支出。3，于吉在一面墙上用彩色的粉笔记录我们谈话中的账目。

整个现场大约持续50分钟，期间有一部分观众觉得无趣就离开了。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们只是谈论账目，而不谈学术，这显然不符合一些人的审美趣味。

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内部讨论，期间小泉问我这个现场是不是一场表演，还是只是一个谈话。我说：我不想去分类和定义它，让它停留在一些概念的边界之处，那多好啊！分类和定义只会束缚事物的可能性，同时也使人的思维变得懒惰。

那颖禹提议这个项目的纪录片可以用日记体的方式来结构，就是一年365天，每天一个章节，或长或短，不去控制纪录片的总长度。这是个很好的提议，我觉得这可以和我的日记结合起来剪辑，日记里的文字叙述可以和影像的记录相互穿插，互相补充。

如果把这个录像交给那颖禹来剪辑，我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不想做一个讲述故事的纪录片。他在仇庄生活了很长时间观察这个项目，和我有大量的交流。

焦东雨的文章写出来了，题目是“波普主席像进村记”，因为几易其稿而错过了新年的第一期杂志，将会在2014年2月刊发。

## 11, 25 块钢板

星期三，2014 年 1 月 1 日 晴

2014 年开始了，似乎我比往年更为平静了，我能感觉到平静给我的快乐。

星期天，2014 年 1 月 5 日 阴

我完成了那些水彩画，回到了仇庄。

看到父母，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话，大家只是吃饭、看电视、收拾。这儿就是这样，父母从来不教我们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鼓励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大多数时候，就是默默的做事情，爱就隐藏在行动里，乍一看，你会觉得彼此都很冷漠。

昨夜看《傅雷家书》，边看着，边读给芳听。读着读着，我不能自己，竟然哭了起来。停下来，擦着眼泪，我哽咽着说：真是不好意思。芳说：我之所以爱你，就是因为你有一颗柔软的心。

查尔斯想把 11 幅水彩画全部买下来，作为 Van Abbe 美术馆的收藏。这些画一共 16000 美元。

在寒冷的地方，人就容易懒惰。条件越是艰苦，越是需要人的意志力，也培养人的意志力。

黑夜，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星期一，2014 年 1 月 6 日 晴

晚上，父亲和母亲把我叫到他们房间里。

父亲阴沉着脸说：“春节后就不要在村里做你的艺术了，去找个工作，上个安稳班去。你这样瞎鼓捣一年，也落不下几个钱儿。”

我争辩说：“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喜欢这个事业。再说，这一年我不也卖了一些画，挣了一些钱吗？我用这些钱完成了这个艺术项目。”

母亲也附和着父亲：“你做这些东西在村子里有啥用呢？又不能卖钱。”

我一阵愤怒，无奈，无语。

我甩下一句话：“我喜欢我做的事情，这是我的事业。”

然后，我什么也不说，就离开了。

出了大门，黑暗中，我站了好久……

这一年来，我的父母是离我最近的人，他们看着我每日工作到深夜，看着我在外面奔波，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他们看不到我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当然，他们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是钱。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价值，即使有，他们也对那些所谓的“价值”不屑一顾。

每当这样的時候，我都觉得我和我的父母在精神上离得很远，很远。

当然，我从来没有指望我来这里改变我的父母，改变村庄，我只是想要让自己回到他们身边，平等地相处。平等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可是，这的确很难。

我的父母亲只是希望我能和其他人一样——赚钱，生孩子，过日子。他们无法容忍我有精神上的追求，无法容忍我和别人不一样。

想到傅雷所给予他儿子精神上的引导，我忽然觉得我的父亲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他自己在精神上是完全贫瘠的，他如何能给予儿子精神上的东西呢？不能给予也就罢了，他却给予儿子一连串的干预和抱怨。

似乎，我和他之间只剩下亲情，再无其他了。

他们一方面善良、勤劳，另一方面却很愚昧、无知。

我又有了强烈的想要离开这里的愿望。离开，我必须离开。

星期二，2014年1月7日 阴

今天去钢材市场，开始制作25块钢板。39元一块，25块，一共975元，加上40元的运费，1015元。

工人在电脑上制好了图，传输到切割机上，在一块大钢板上切割，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就切割出来了。老板问我拿回去还要怎么处理，是否要打磨，喷漆，装饰，然后做成艺术品？

我说：“就这样了，拿回去就是艺术了。”他不解。

运回家后，父亲帮着一块块摆在走廊下面，以免被雨淋了。他同样不解地问：“这样摆在地上就是艺术了？”我说：“是的。”他说：“几块钢板，摆地上为什么是艺术？它有什么好看的呢？”我说：“这个美国艺术家看别人都把作品挂在墙上，他就摆在地上，这会打破观众观看的习惯，观众还可以踩在上面，这就成了艺术。”

父亲依然追问：“你这不是浪费钱吗？又没有人买这个作品。”我说：“以后不用了，你可以作为钢铁卖出去，不就可以收回来钱了吗？”他算了算，钢铁8毛多钱一斤，可以卖400元。于是，他似乎有些安心了。

星期四，2014年1月9日 晴

今天有阳光，我的父母帮我把25块钢板铺在院子的中央。尽管父亲抱怨这个作品没有意思，他还是尽心地帮我工作。因为院子里的砖地铺得不平，我们先在地上铺一层沙子，然后一块块地把钢板铺上去。父亲有心脏病，不能下蹲，只能弓着腰工作，母亲帮着他抚平沙子，搬钢板。摆好了，父亲觉得不满意，他觉得钢板上的纹理有些凌乱。于是，他重新调整了有纹理的钢板。过了一会儿，他饶有兴致的把他的鸟笼提了出来，一个鸟笼放在一块钢板上，放满了。在鸟儿欢快的鸣叫声中，他提着两个鸟笼让我给他拍照。这次，他看着他的“作品”，满意了，搬了个椅子，点上一根烟，坐着欣赏。

母亲的头发有些凌乱，衣服穿得很厚而导致动作不够舒展，显得弱小。看着她的身影，我竟然心生怜悯起来。我还是喜欢看父亲工作时的动作，很大气，甚至有一点霸气，尽管他已经老了。在摄像机面前，父亲很有表现的欲望，似乎他也很陶醉于被拍摄中。我看得出，他今天很快活，休息时抽了两根烟。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制作完成。

星期六，2014年1月11日 晴

我坐在被窝里，暴露在外面的身体依然很冷。记得去年冬天，我要戴着棉帽子睡觉，我满手冻疮。进入今年冬天的严寒时期，没有雨雪。照例，商店旁边燃起了树根，聚集了一大群人，讨论政治，讨论经济，讨论新闻，讨论村子里的人和事。早上和母亲产生了一些争执，我觉得她越来越不明智，胸襟小，而且很啰嗦。我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没有办法工作，除非她不再对我抱怨和啰嗦。人在极度寒冷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无法思考，甚至容易疲倦而入睡。

星期天，2014年1月12日 晴

今天是农历12月12日，母亲的生日。这里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关心过她是哪一天出生的。父亲不知道他是哪天出生的，他曾经问过奶奶，奶奶忘记了。

星期三，2014年1月15日 阴

再度回到纽约，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一样。看着地铁里陈旧的人们，窗外满眼的涂鸦，似乎回到怀旧的电影里。

星期六，2014年1月18日 雪

我在否画廊做了一个“仇庄项目——一些人和一些事”为题的讲座，主要介绍我父亲、魏以明、卢道德、杨高举、孙光法和钟鸣等一些参与了仇庄项目里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晚上讲座的整体气氛很好，我提前写了讲演稿，这保证了内容的可控性。整个过程，观众都能保持兴趣。第二部分是和艾伦的对话，以及观众的提问。艾伦很客气，更多的表达她对对这个项目的喜爱。观众也是一样，表达喜欢的同时，用一些简单的问题引导出那些我没有讲的内容。

其实，从几次讲座中观众的反应来看，这个项目是很有趣的，这种趣味性导致了雅俗共赏的结果。可是，这种“有趣”会掩饰学术上的肤浅吗？徐坦说观众的问题不专业，有些肤浅，不能把问题往深入里讨论。

一个女孩约我再次会面，谈一下关于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这是文化殖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觉得这是文化殖民？什么是文化殖民？村民自己为什么不觉得被殖民？殖民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很多年前，西方一些国家到中国用强盗的方式把中国的艺术带回到西方，放在美术馆里展示，尽管这给了作品很好的保护，可是依然掩饰不了这是被强制拿过来的；今天，我把西方的艺术用另外一种方式带回中国的村庄，这样就成了文化殖民吗？

回到酒店房间，和徐坦继续聊天。我们谈到艺术和艺术品，他说不要把艺术品和艺术混淆了。在我的父亲把鸟笼挂在索尔·勒维特的架子上的时候，他愉悦了，那时候艺术就有了，那就是艺术。把架子和鸟笼拍成照片，拿到美术馆展示，那只是艺术品。

星期二，2014年1月21日 雪

今天大雪，从酒店的大门向外看出去，纽约的街景很美。

很多西方人支持中国人，帮助中国人，这里有一种优等民族对边缘落后民族的怜悯情节，这种怜悯情节导致不能深入地讨论问题，探讨被情感给挡住。当然，这种怜悯情节是非常善意的，友好的，单纯的。学术上的探讨应该处在一种平等的，一个相同的平台上，才有可能面对真正的问题，才有可能把问题往深处探究。

在讲座提问的环节，一个男孩谈到我选择的那些艺术的历史上下文在我把它们带到村庄之后是否已经不起作用和消失了？艾伦就很快地回答：村民从美学的角度接受了这种艺术，不一定要有上下文，每个村民有权利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接受艺术。

这样，艾伦怀着善意来回避了原作上下文的重要性，使问题停留在了村民有权利接受这些作品上。原作的历史上下文是否一点都没有可能进入村民的世界吗？一定要去掉它原来的文化背景吗？如果村民只是从美学和实用性上来接受艺术，是否过于简单了？

星期四，2014年1月23日 晴

雪停了，天气晴朗。

我意识到能出来走一走的重要性，并不是学习到多少知识，看多少展览。这可以让我有一个开放的状态，开放的思维和看问题的方式。我能感觉到，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会不自觉的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人就不够灵动了。其实，是否能做出多少作品来并不重要，而生命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好的状态，健康的状态，自然会出一些作品的，即使没有作品也没有关系。

星期五，2014年1月24日 晴

我从纽约回到了苏州。

芳芳说我非常僵硬，一点也不柔软。

是这样的，每次和她分开一段时间，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够柔软，因为我还不适应。通常，过一两天，就好了。



星期天，2014年1月26日 晴

我叔叔的二儿子海涛计划在大年初六结婚，叔叔请客，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如果你需要村里的人们来帮忙，就要提前请大家吃一顿饭。

我父亲和叔叔因为上次挣地的事件一直不说话，不来往。魏老师觉得这是和解的一次机会，就让叔叔到家里来请父亲。父亲决意不和叔叔来往，也就不想接受叔叔的邀请。终于，还是勉强去了叔叔家，只是露了一下面，没有吃他家的饭。

父亲坚持不和叔叔来往，他说他会在婚礼上出礼金，但是不吃他家的饭。

星期一，2014年1月27日 晴

依然没有下雪。或许，这是一个没有雪的冬天。

气温并不低，可是在仇庄依然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不烧炉子，人们抵御严寒的唯一方式是穿得更厚一些。

母亲说前几天的夜里刮大风，丹·弗莱文的灯光装置上面的防雨布被风吹开了，两只灯被刮烂了。

要过年了，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陆续回来了。

我问父亲：“如果你意识到你做错了事情，你会承认错误吗？”他说：“会的。如果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会认错的。”我说：“那你还是很勇敢的。”母亲在一边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认过一次错！”

星期三，2014年1月29日 阴

我从来没有那么无奈和无助过。

面对我父母的狭隘和愚昧，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说多了，反而令他们对我心生怨恨。

我以为我的父母善良、正直，可现实却远非这么简单，他们像其他农民一样狭隘、自私、愚昧和无知。农民所具有的弱点，他们都有。

我不忍心看我的父母活得这么苦。可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心灵之苦。

晴晴和她的男友李荣舟给我寄来一些书，还有一幅书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

星期四，2014年1月30日 阴

今天除夕。

前天，我和几个仁兄弟（老大、老二和老五）去给老四上坟，老四蒋永军2009年的时候出车祸离开人世。他的坟刚刚向前挪了8米，和他刚刚去世的母亲的新坟紧挨着，坟头上有新的花圈。

之后，我请大家在县城吃饭。老三李成新每年这个时候都忙着杀猪，要杀到夜里12点，所以他缺席了。我越来越觉得和大家之间有一道墙，他们不了解我，而我也很难和他们沟通。

像去年一样，我买了2个很大的烟花在夜里燃放。

父亲把鞭炮放在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上燃放，声音特别响亮。一阵火光和浓烟过后，钢板上被炸出烟火的痕迹。

星期五，2014年1月31日 阴

仇庄依然保留着过年为长辈磕头的习俗，这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已经看不到了。我曾经很憎恨这种习俗，可是每到大年初一早上，我还是入乡随俗了。就这样，几十年都磕过来了。

魏老师准备了一盘四千响的爆竹，噼里啪啦地放完了，图书馆在新年的第一天，开门了。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的这一天，我也是点燃了一挂爆竹，人们蜂拥而至，图书馆正式开张了。到现在，图书馆存在了整整一年。

我前几天给我的好朋友小石家送了一个大烟花，他的二女儿石宇潼每天都会抱着烟花问：“爸爸，什么时候放烟花啊？”终于等到了除夕的晚上，他们一家人把烟花搬到楼下，小石点燃了烟花……宇潼吓得跑进楼道，等到烟花放完才敢出来。她没有看到烟花，她只看到一截彩色的火苗从烟花里不停的往外喷。

我鼓励宇潼把她看到的烟花在小黑板上画出来，她画得一丝不苟，线条肯定有力。这个孩子有画画的才能。爸妈都嘲笑他只看到一截火苗，错过了烟花在天空炸开的美丽。我说：“明年我们再买一个漂亮的烟花。那时候，你也变得勇敢了，你会看到在天空炸开的烟花。到时候，再把你看到的烟花画出来。”

## 12, 树枝圆圈

星期三, 2014年2月5日 雪

大年初六, 下起了大雪。这是一场期盼已久的雪, 一场迟来的大雪。

村庄里的肮脏和杂乱被大雪覆盖, 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些艺术作品在村庄里, 和着纷飞的大雪, 显得格外美丽。

哈利的生命里第一次遇见大雪, 它激动地跑着、跳着, 身上的雪化成了水, 使毛发都一簇一簇的, 像一个刺猬。

出生在南方的钟鸣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大雪里, 他像一只老虎一样扑进父亲堆起的雪中, 弄得满身都是白雪。

海涛结婚, 父亲让我交了礼金, 却坚持不去叔叔家, 不吃他家的饭。他说他并不打算和叔叔和好, 他说一辈子再也不和叔叔打交道了。

喜宴过后, 地上一片狼藉——塑料袋、塑料桌布、一次性碗筷、骨头。最后, 这些垃圾都被扔进干涸的河里。

一天中, 我拉了三次肚子, 肯定是在婚宴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小时候, 最欢喜能吃到婚礼上的大餐; 现在, 我最怕吃村里的婚礼大餐。现在虽然食物丰富了, 可是卫生条件实在太差: 肉和蔬菜是不清洗就直接切了进锅的, 碗碟是从洗了无数次的脏水里过一下就用的。如果是夏天, 成群的苍蝇在菜肴上叮咬之后, 人们开始享用。无论厨师还是帮工, 都不会洗了手再作业。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我们给4个洗碗的帮工每人多发了一盒烟, 那次的碗就洗得很干净。我打算向村里的“大老知”魏老师建议: 洗碗工最辛苦, 他们的“酬劳”要高一些, 每人要发一个围裙、两盒烟、最好再加一双橡胶手套, 以保证他们把碗碟洗干净。

星期四, 2014年2月6日 雪

汪欢迎几年来一直在上访和打官司。因为要修路, 他建在大桥西头的商店被作为违章建筑来处置, 而大桥东头相同位置村支书的建筑却安然无恙。他不服气, 就开始上访, 但是当地法院偏袒村支书, 不断恐吓他, 并且要强行拆除他的商店。他不服判决, 就开始利用网络、写信等一些手段向省里和中央维权。

春节前，朱信义帮欢迎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梅花欢迎漫天雪，下联：冻死苍蝇未足奇。横批：天马行空。红纸黑字的对联贴在他商店的门两侧和上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星期五，2014年2月7日 雪

雪一直在下，积雪很厚。

我把家里院子里的雪堆在一起，在卡尔·安德鲁的钢板上堆起两座雪山。钢板因为雪水而生锈了，颜色由深灰转为赭黄色。

我、诗如和仇忠家一起在索尔·勒维特的墙画前堆起两个雪人，还做了几个小雪人儿，作为两个大雪人的孩子。

星期六，2014年2月8日 阴

雪停了，房檐上挂着很多尖尖的冰溜子。

有些孩子把冰凌子从房檐上打下来，拿着像一把锥子一样，当成冰棍漱着吃。

星期天，2014年2月9日 晴

天气寒冷，人就容易懒惰。这几天，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很晚。

河堤上满是积雪，风很大，我应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把理查德·朗的“树枝圆圈”做出来。把树枝摆在雪上，等雪融化了，树枝自然就在地上了。

据说修路的事情逼近了，大桥已经在年前开始动工，三月份动员拆迁，六月份修路。

我手上的红色斑点出现了，一到夜里就很痒，这是冻疮。

星期一，2014年2月10日 晴

看河堤上的雪逐渐化了，越来越少。我决定在雪融化之前完成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树枝圆圈”。

我家的田里有很多苹果树枝和杨树枝，母亲、钟鸣和我工作了整个下午，将那些树枝整理好，码在一起。

因为劳动，身体因为出汗而舒服。很久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亲近自然了，我总是离艺术和书本太近，离自然很远，离劳动人民很远。

星期二，2014年2月11日 晴

我打消了请图书馆对面的樊大娘制作树枝装置的念头，因为她年纪大了，我不好意思请她这样在河堤上工作一整天。另外，他的丈夫身体瘫痪，需要她一日三餐的照料。

我请我二婶子（来源的妈妈）帮我制作这个作品，还有我父母给我们帮忙。

我在河堤上选了一块不种庄稼的空间，确定圆心，用三米五长的绳子在雪地上划了一个直径七米的圆。参照理查德·朗的指示说明，尽可能的使每一组树枝都是平行的，这样摆满一个圆。

二婶干活很麻利，在我示范了几组后，她就能自己确定该怎么摆放。母亲要迟钝一些，总是摆错。

大概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整个作品。

地上的积雪融化了很多，露出深褐色的泥土。树枝是新的，崭新的树皮颜色有些扎眼。整体上，这个作品和环境很协调，甚至于一些路过的人都没注意到它的存在。我想，理查德·朗在大自然里完成这件作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吧，绝不会像我们在画廊里看到的那样，像一个标本。

这是复制的10件作品中的最后一件。我最初选中的场地被主人搭了棚子，一直在等合适的场地。总是觉得这件作品很难做，就一直等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一场大雪过后，我才意识到该做这件作品了。没有想到这件作品完成得那么快，那么轻松，那么省钱，那么不突兀。

父亲担心这个作品会被村民偷走当柴禾烧，住在附近的一个大爷说他会帮我看着，除了住在旁边的憨子，其他人不会偷。只怕这个憨子来偷柴禾，他不懂得这是艺术。

整个下午，我都在旁边端详着这件作品。因为树枝的摆放方向不同，不同的方向因为受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有青灰色，有暗褐色。亮部呈暖色，暗部呈紫灰色。一些积雪夹杂在树枝的缝隙中，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则只是深褐色的土地。整个圆圈摆放在不太平坦

的堤上，圆形显得不太规则。河水已经结冰，对岸的河滩上依然覆盖着白色的积雪，一片苍茫。沿着河的两岸是枯黄色的芦苇，随风摇摆。

这里紧邻着村庄，我能听到村庄里的狗吠、人声和鸡鸣，还有附近垫土填河的推土机声。夕阳下，整个圆圈被撒上一层金色。慢慢的，金色散去，它和环境整个儿黯淡下来，天黑了。

我期待这个作品能在这里经历春夏秋冬。

星期四，2014年2月13日 晴

今日乐大豆 (Davide Quadrio) 和葛拂兰(Francesca Girelli)来到仇庄。

大豆说话有些快，这样导致我不能按自己缓慢的节奏思考和表达。说了很多，却都不能深入讨论。我想，不管做任何事，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别人的节奏打乱和影响。大豆到这里来之前带着很多固有的对这个项目的经验和认识，这导致他不能静心地观察和体会这里的事物。而我，应该控制住整个参观的行程节奏。

葛拂兰在项目的初始阶段买过我一幅水彩画作为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我很高兴她能来到这个项目的发生地。

星期五，2014年2月14日 晴

正月十五，元宵节。看不到多少孩子在路上打灯笼，只是偶尔有烟花在村庄的上空炸开。不像我小时候，每个男孩子都会挑着爷爷扎的灯笼在路上聚集在一起，比着谁的更好看，这样持续到正月二十。

星期天，2013年2月16日 阴

下午，图书馆播放《玛丽与马克斯》，几个孩子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剩下我、钟鸣和魏老师坚持看完。

这里有很好的电影和图书，可是却没有观众和读者。

图书馆对面的樊敬义大爷找人给自己制作了棺材，棺材做好后放在他儿子的院子里。之后，他就不再吃饭了。

上午我们把这一年拍摄的录像带快递给了那颖禹，由他来剪辑这部纪录片。我让钟鸣再检查一下邮寄的地址是否正确时，我发现居然只写了一半地址。我惊异他居然犯这样的错误，他沉默很久，缓缓的说：“还是粗心呗！”

到了钟鸣的工作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他不适合这份工作。或者说，他不适合做我的助手。选择他来仇庄工作，是我的一个错误决定。

他整整在仇庄工作了一年，我已经发了他12个月的工资。最后，我还是决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他。因为当我告诉他将要停发工资的时候，似乎有些残忍。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不是为他，而是为我自己，为了让我心安。

叔叔的二儿子结婚，我们帮他拍摄录像和照片，最后剪出来一个26分钟的片子，刻成3张光盘给他。叔叔看了后，来找我们，说片子的时间太短了，希望能长一些。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他又要求我们把那些结婚的照片打印出来。我还是拒绝了他，我说我已经把照片拷给了他儿子海涛，他可以自己去冲洗。

面对人们的贪婪，我有些气愤。而钟鸣一味地满足人们的贪婪，不懂得如何拒绝，更不会征求我的意见。这样浪费了我们很多不必要花的钱。

我能看到人们的自私、狡猾和贪婪，我想远离这些人和这个地方。我不得不放弃隐藏在我心里的愿望和理想，因为我的工作对他们没有意义。

或许，我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安静地呆上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

## 后续

星期一，2014年2月17日 雨

我离开仇庄，回到了苏州的家。从寒冷的家乡回到温暖的苏州。走在城市的马路上，我感慨周围的风景很无趣。在仇庄的一年，我拍了很多照片，而在这个城市里，我带着相机，却什么也不想拍。

星期三，2014年3月19日，雨

昨天母亲打电话说图书馆对面的樊敬义大爷死了！

我愕然了许久，我是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却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快。春节后，他找人给自己打好了棺材，看着棺材，他就不想吃饭了。过了几天，他在一个晚上吃了一大瓶药丸，第二天被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医生说他差一点就被过多的药烧死。回到家后，他的腿开始肿，越来越厉害，整个下半身开始淌灰色的水，樊大娘说那既不是血也不是脓。他开始吃不下东西，他告诉樊大娘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他要到另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去。第二天傍晚，他就咽气了。

我去年给他拍了大头照片，没想到这么快就作为遗像用在他的灵棚下了。他坐在索尔·勒维特的墙上雕塑下面听戏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似乎他和那件作品是一体的。

星期三，2014年3月26日 晴

昨夜梦到父亲的金丝雀鸟儿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无奈的父亲不停地把死鸟从活鸟群里拿出来，一大堆挣扎着即将死去的鸟儿。



[Limuff@gmail.com](mailto:Limuff@gmail.com)  
[www.iamlimu.org](http://www.iamlimu.org)